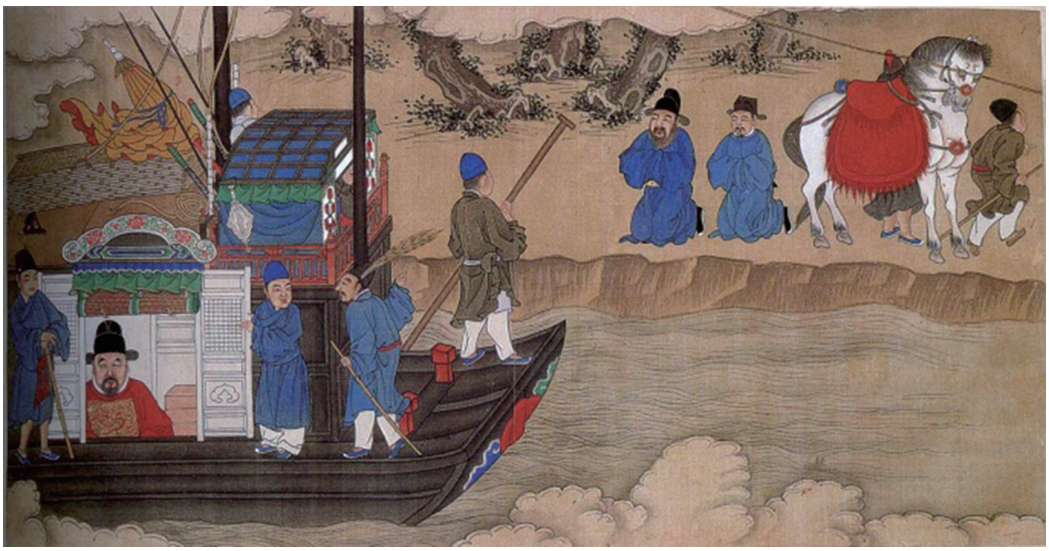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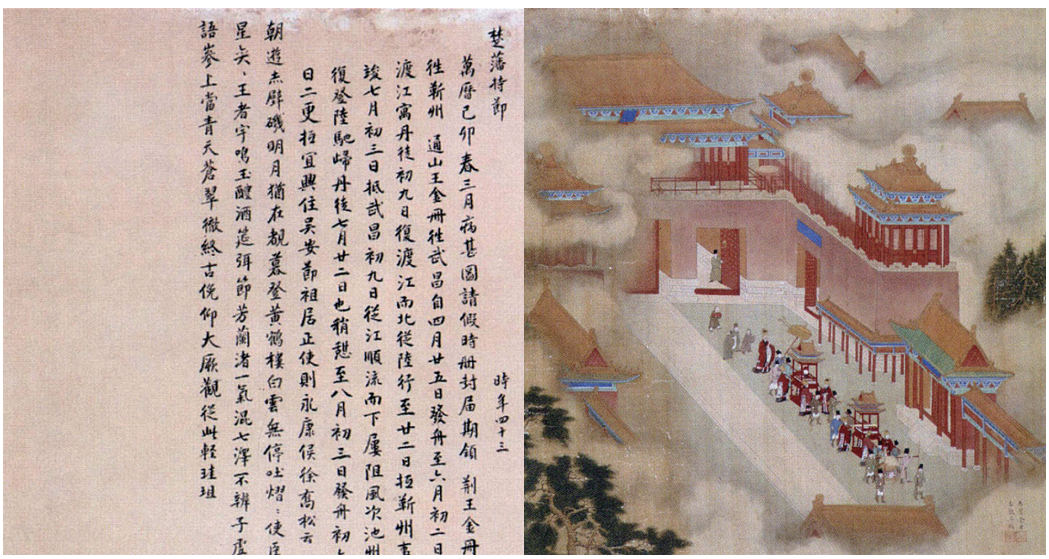


明人《王瓊事蹟圖》〈督理漕運〉中國國家博物館



余士、吳鉞《徐顯卿宦蹟圖冊》〈衝雪還朝〉 北京故宮

臺灣大學



余士、吳鉞《徐顯卿宦蹟圖冊》〈楚藩持節〉 北京故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OI: 10.6541/TJAH.2016.09.41.05

天下名勝的私家化：清代嘉、道年間自傳體紀遊圖譜的興起①

梅韻秋*

【摘要】中國近世的官員士子除了藉由碑傳文字，亦常利用傳記圖來紀念生平經歷或彰顯家聲祖德，所採圖式歷來均以敘事人物畫為主，惟獨清嘉、道年間流行的樣式大異，偏尚以名勝山水圖來呈現。如張寶《泛槎圖》、麟慶《鴻雪因緣圖記》、張維屏《花甲閑談》及劉愔《悟薖亭畫稿》等皆屬佳例。其編繪體例多以個人一生履歷為經、天下各地勝景為緯，將原本作為搜奇探奧或觀光導覽之用的天下名勝圖轉成一種表述個人事蹟乃至家族歷史的視覺媒介。別具時代意義的是，天下名勝圖原先皆出於私修，但盛清時期卻僅見官修欽定之作，測繪帝國江山勝概的活動至此儼然已遭清廷全面控管，似不再任由個人私自造作。因此，這批傳記體名勝圖的出現，可說亦代表了圖寫帝國景觀風貌的主導權又重歸私家之手。

關鍵詞：傳記圖、名勝圖、張寶、麟慶、張維屏

前言

十九世紀前期清朝國勢由盛轉衰之際湧現了一批新型態的自傳體紀遊圖譜，其中以張寶（1763年生）《泛槎圖》、張維屏（1780—1859）《花甲閒談》及麟慶（1791—1846）《鴻雪因緣圖記》最受今人稱許，往往被視為嘉慶、道光年間山水地理類版畫的最佳範例，② 惟對於這群作品的探討，迄今

① 本文承蒙匿名審稿人慨然賜正，以及國科會計畫（編號NSC 100-2410-H-007-047-MY2）資助，特此致謝。

*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② 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收入氏編，《中國古代木刻畫選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第9冊，頁83；周心慧，《中國古版畫通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頁305-307；瀧本弘之，〈明清名勝版畫小考〉，《中國歷史名勝大図典》（東京：遊子館，2008），頁16-19。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多屬概論性的介紹，專門性的研究則尚未見展開。以體裁論，這幾部圖譜均是採貌似傳統名勝紀遊山水圖的形式來記述個人畢生的親身經歷與事功。表面上雖只像是一部圖繪式的個人傳記或山水遊記，但就如同當時盛行的年譜或回憶錄之類的著作，它們也可以被視做是一種有別於官方正史的私修當代史實錄，透過作者本身豐富的閱歷與廣遠的遊踪來呈現地方民情風俗、時代文化新貌、政經社會變局、乃至天下帝國縮影。由於個人身分地位和經歷的差別，上述三部自傳的主人在圖像的選材取鏡上亦各有千秋。麟慶是督撫級的封疆大吏，張維屏是地方父母官，張寶則是曾任幕友的落第文人，三人分別代表了清代宦海中的三種典型人物。事實上，中國帝制時期的官僚體系成員在一代視覺文化的締造上，始終佔有一席之地。為了有效施政化民或與君主溝通，他們常需借重圖像或其它視覺媒材的輔助，如現存大量的各式地圖以及有關農田水利、救荒捕蝗、治河通漕、邊防武備、典章制度、倫常教化之類的專書插圖，許多都是由他們籌措製作，說他們是一部產能極高的圖像製造機器也不為過。惟其所生產的圖像多偏重紀錄性與實用價值，製作未必力求精美。因此，當盛清宮廷藝術尚如日中天之時，他們不免相形失色。但自十八世紀末宮廷藝術式微之後，他們的主導性和能見度均大幅提升，尤其是像麟慶這類左右逢源的封疆大吏，力足以動員治下為數可觀的屬吏並開設編制龐大的幕府，延攬多名僚屬幕友為其製圖作畫，③ 儼然有取代宮廷畫院之勢，成為十九世紀帝國景觀新貌的代言人與紀錄者。

這些嘉、道時期的旅遊見聞錄，在畫風上雖無顯著突破前人之處，但卻可提供大量視覺影像見證，圖像製作亦銳意求工，比起一般官僚機器化生產的作品，自是更易引人入勝。或許正因為如此，數十年之後的光緒年間，即

③ 麟慶在《鴻雪因緣圖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中曾兩度撰文列舉自己的幕僚成員，其一為〈蘭館寫照〉，共列有12人，其二為〈芑香寫松〉，共列有18人，詳見是書，頁246-247，510-511。而為此書繪圖的畫家，前後有汪英福、陳鑒、汪圻及胡駿聲等，亦均為麟慶的幕友。此外，麟慶擔任河道總督時也曾倩屬吏為其著作製圖，如《河工器具圖說》一書的插圖便是由他的部下卞駿超及譚慶成繪成，見麟慶，〈謙豫編圖〉，《鴻雪因緣圖記》，頁448。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使時移境遷，這類圖譜依然被認為具有賣相。例如晚清由英商美查（Ernest Major）在上海創辦的新式傳播媒體申報館暨附屬的點石齋書局，便曾將《泛槎圖》和《鴻雪因緣圖記》的木刻本重新以甫引進中國的西式照像石印技術縮印，廉價銷售。目前可見的點石齋石印本之中，《泛槎圖》僅有光緒六年（1880）版一種，不算暢銷。而《鴻雪因緣圖記》則屢經再版，計有光緒五年（1879）、六年（1880）、十年（1884）和廿二年（1898）等四種。且除了點石齋諸本之外，另外還能見到上海同文書局在光緒十二年（1886）刊行的石印本一種，可知市場的反應頗佳。到底當時的購閱群眾是受此書哪些特點所吸引？現今雖已無法直接藉由他們親身的證辭來剖析，不過至少尚能間接透過一則申報館於1879年6月28日刊登在自家報紙頭版的廣告來逆推：

> 《鴻雪因緣圖記》者，前盛京將軍崇樸山（崇實，1820—1876）節帥、今出使俄國欽差大臣崇地山（崇厚，1826-1893）宮保之先德前河帥見亭先生（麟慶）之所作也。先生剔歷中外，卓著□聲，而述德陳情、承流宣化、朝廷盛典、仙佛奇踪、瓠子防秋、柳營講武以及家庭之樂趣、山水之清遊，無一不託之於圖。始自垂髫問字，繼及釋褐登科，中逮筮仕名區，終於退休林下。分為上、中、下三冊，每冊各八十幅，共為圖二百有四十。渲染工細，點綴玲瓏。繪山則雄秀清奇，不名一格。繪人則精神笑語，如添三毫。畫水則聽之有聲，摹景則味之無極。飛潛動植，悉暢生機。南北東西，幾周屐齒。且於紀國恩、詢民俗、定方輿、辨□產諸事，尤屬慘澹經營，不遺餘力。蓋畫工之技於是神，而先生之心於是慰也。然猶慮代遠年湮之後，閱是圖者茫乎不知其命意之所在，於是又每圖各系以小記，或回溯前蹤，或備陳近事。圖之所不能盡者，以記盡之。記之所不能寫者，以圖寫之。雖年譜之濫觴，實紀遊之創格。記既成，爰延巧匠勒為成書。該匠等亦深明畫理，用能使作者之隱微曲折，不爽毫厘。原板鋟竟，節帥、宮保謹藏於邸，祇印數十百部，分贈知交。近日京中始有稍稍求售者，索價動須銀數十兩。而坊間翻刻之本，或寖失其真，或竟遺其記，遂使宇宙間少雙寡二之奇書，漸漸湮沒，良可浩歎。本館自創設點石齋，仿泰西照相石印之法以來，特不惜重資，購求原本，勒諸貞珉。又嫌原本之過大，而繙閱之累贅也。縮存四分之一，細於牛毛，密於繭絲，而深淺遠近，仍復一一分明，與元本後先輝映。若此細圖，即欲付手民雕刻，恐離婁復生，亦當望而卻步矣。昔人以詩書畫誇為三絕，今《鴻雪因緣圖記》，圖則擅寫生之妙手，記則具賦物之清才，而點石齋之印工，又為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天闢地以來奪造化、轉鴻鈞之奇術，稱為三絕，允當無愧。④

這篇行銷文字，一方面稱許《鴻雪因緣圖記》所記之事，從國恩朝典到家庭生活、從歷史古蹟到時事今聞、從山水遊踪到仙佛奇緣，無所不涉，另一方面也盛讚原圖的畫技細緻生動、刻工精準逼真。可說圖文內容之包羅萬象以及刻繪技術之精當純熟，確實是此書受人賞識的要素。然而，即使廣告用語難免誇張溢美，但單憑上述那些稱不上獨步的長處，恐怕尚不足以讓申報館敢信口開河，逕自譽之為「宇宙間少雙寡二之奇書」。事實上，此書之所以令清代讀者耳目一新，主要還在於其體例具有鮮明的開創性，亦即文中所說的「雖年譜之濫觴，實紀遊之創格」。換言之，這是一種前所未見將年譜與紀遊二體合而為一的新體裁。同時，此一新裁還是以過去少見的圖繪形式來呈現，遂更顯得與眾不同。因為清人所撰著的年譜或紀遊之作雖不勝枚舉，但以圖畫等視覺語言為表述骨幹者卻不多見。而在這些為數不多的現存個案之中，絕大多數又都是嘉、道年間的產物，很難不讓人好奇為何此際會格外時興這類自傳體的紀遊圖譜？是誰引導了這波流行？這類圖譜的特殊體裁是從何而來？而它們集中出現在嘉、道年間又有何意義？為了解答上述一連串的問題並給予這群作品更確切的歷史定位，本文除了將梳理相關圖像在十九世紀的發展，也將追索其在十九世紀以前的演變之跡。

一、張寶的壯遊寫生與道光朝天下名勝紀遊圖譜的再興

種種跡象顯示，自傳體紀遊圖譜在十九世紀前期蔚起，嗜遊成癮的南京布衣畫家張寶及其自繪的《泛槎圖》應當是最關鍵的風潮帶動者。據張氏自述，他早年曾有意功名，但偶因考試失利，又自覺「生逢盛世，四海昇平，君聖臣賢，士民樂業，度區區之庸才末技，知無補於國家」，廿歲即決定放

④ 申報館，〈石印《鴻雪因緣圖記》縮本出售〉，《申報》，光緒己卯五月初九日（1879年6月28日），版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棄科舉一途，以遍遊天下名山大川為志。⑤ 生平所至，及於冀、魯、晉、陝、豫、蘇、浙、皖、贛、湘、鄂、閩、粵、桂等十四省。其出處抉擇和壯遊豪舉，與晚明地理探險家徐宏祖（1587—1641）多有不謀而合之處，故當時梁章鉅（1775—1849）曾以「前身莫是徐霞客」之語來形容他。⑥ 同時，他也如徐氏一樣勤於親手記錄自己的遊蹤。惟徐氏所著的《徐霞客遊記》乃採一般慣見的文字敘述，張氏的紀遊之作《泛槎圖》則轉以圖像為主要媒介，且下筆力求逼真，「所有亭臺樓閣、寺觀城池，位置各得其所，峰巒水石，各肖其形，橋梁舟車，隨其地之情形以點綴之」，故與實境相比，他自認「俱有八九分相似」。⑦ 而這部圖畫式遊記的規模亦頗可觀，前後共六集，依序成於1819、1820、1825、1826、1827及1831年，有圖103幅（表1），大致是按年歲來記述其一生重要的旅程。初集含13圖，首幅為〈乘槎破浪〉（圖1），可說既是個人的自畫像，亦是一種「字號圖」。圖中只見他如仙人般倚坐在枯槎上遨遊大海，一方面標舉自己雲遊四海之志，另一方面也點出了其字號「仙槎」的意象。其餘12圖則紀錄了1806年他應聘為禮親王昭槤（1776—1833）的入幕之賓而展開的生平首度進京之旅，圖中所繪均為當時從南京循長江及大運河至北京的水程沿線要站。至1809年，他又應山西巡撫成寧之邀，離京往晉、陝一帶遊歷，登覽了恆山、華山及嵩山之後才返鄉。接著再次北上入都，回程曾順道登泰山。1818年他有廣東之行，途經湖南時又趁便一登衡山，遂完成了許多人夢寐以求的五嶽之遊。而續集所收錄的23圖，正是他這十年間造訪五嶽及各省名勝的成果。

遊畢五嶽之後，張寶已年近花甲，《泛槎圖》第三集中的27圖主要就是他1822年在家歡度六十大壽前後的行蹤紀錄，包括1821年自廣東歸返南京之旅，以及1823年從揚州南下遊江南、浙東諸名勝，最後抵福建武夷山，再循水路經江西、安徽返家。至此，他始興起「歸老林泉」的念頭，故第四集所收錄的18圖全是其家鄉南京的名勝，且最末一幅〈大山廬墓〉，甚至算不上是觀光景點，而是他為父母營建的墓葬之所，頗富飲水思源、落葉歸根之

⑤ 張寶，《泛槎圖》（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四集，頁2a。
⑥ 張寶，《泛槎圖》，六集，頁22b。
⑦ 張寶，《泛槎圖》，續集，頁1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意。不過，此一高掛遊屐的盤算在1826年即受到延宕，本年他又再度前往廣州。隔年適逢友人葉紹本（1767—7841）由廣西按察使陞任山西布政使，張寶為了送行而放舟瀝江之上，得以暢覽昭州至桂林二百餘里的山水古蹟，並繪製《瀝江泛棹圖》長卷來紀念。此卷隨後被改成12頁冊行世，即為《泛槎圖》第五集。自廣西之旅後，張寶未再遠遊，但仍繼續將《泛槎圖》增編至第六集，有圖10幅。前7幅繪崑崙、峨嵋、點蒼、疊翠、五臺、武當、五指等七座他從未登臨過的名山，明顯打破了《泛槎圖》向來只錄其生平親覽親遊之地的體例。為此，他曾提出如下解釋：

> 天下山川皆祖崑崙，惟艮、震、巽三脈入於中國，分支演派，散為五嶽名山。終南山與中嶽、西嶽、潛嶽、天柱、武當等山，由甘肅分結陝西、安徽、河南省會，是震脈中幹行龍。其水由淮安、揚州入海。長白山並五臺、北嶽、東嶽、盤山、西山、太行，分結盛京、直隸、山西、山東各省，乃丑艮行龍。分支之水由盛京、直隸、山東入海。岷山、峨嵋、點蒼、疊翠、南嶽、匡廬、羅浮、武彝、黃山、九華、天目及台、蕩諸山，結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廣東、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江蘇、浙江等省，乃巽脈行龍。其水由雲南、廣東、福建、江蘇、浙江歸海。此天下之大勢也。至於五指乃海外名山，在瓊州府之南，亦由崑崙發脈，雷瓊度海，有分水洋可証。第念四十餘年橐筆浪遊，已歷十有四省，尚有甘肅、四川、滇、黔等省屐齒未到。前五集已有圖九十三幅，今將四省著名之山並五臺、武當、五指人所共知者，擬作七圖，刻於篇首，共成百幅。雖未得廬山真面，曾聞友人話其形勢，約略橅其大概，使未了之緣，恍結於尺幅中云爾。⑧

可知張寶之所以添繪這七座名山，除了想藉筆墨臥遊來彌補自己無緣親歷其境的遺憾，並將圖幅總數湊成整數一百，亦有意將《泛槎圖》強化成一部地域分布更完整且地理學觀照更濃厚的天下名山圖譜，讓讀者不僅能見到全國十八行省的代表性名山，還能透過這些名山進窺發源自崑崙山的中國北、中、南三大龍脈。而為了首尾完整呈現此一天下山脈大勢，張寶又在第

⑧ 張寶，《泛槎圖》，六集，頁2a-3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六集的末端附上虞山和狼山圖3幅，原因是這兩座夾峙長江出海口的江蘇名山，既是「長江之大收束」，亦是「崑崙之盡脈」。⑨

《泛槎圖》不單圖幅數量大，題跋詩文更夥，計有四百餘則，且有半數是出自當時政壇或學術藝文圈名流之手，包括成親王永瑆、翁方綱、包世臣、阮元等。⑩ 然而張寶以區區一介布衣，何以能夠遊走公卿之門並廣邀各方菁英為他題詩製序？這不得不歸功於他在1806至1809年間滯京擔任禮親王幕僚的經歷與際遇。雖然入幕的時間不長，但憑藉親王府雄厚的人脈關係，他結識了不少雲集京中的名公鉅卿、文人學者及八旗舊家。正因北京「人文輻輳，且多舊交」，當他發現《泛槎圖》第三、四集的「題詠尚少，難以成帙」時，還特地於1824及1825年兩度入都索詩求題。⑪ 而隨著他的旅蹤和交遊圈日漸開展，《泛槎圖》題跋者的身分來歷也益趨複雜多樣，不僅「自王侯公卿學士以至布衣方外閨秀，皆有題贈」，⑫ 連外邦人士如朝鮮貢使李鎮華⑬ 以及未成年的早慧學童如廣東順德十二歲童子何夢書、十四歲女童何月卿等⑭ 亦有文詞相酬。這數百篇題贈詩文由於多屬應酬之作，內容常不免流於陳套，但對張寶而言，卻無一不是他與各界名人交往結緣的文字證明。可說他的壯遊活動，並不只是遍訪天下名勝，還應當包括廣結海內名士。且除了證交之外，這些題贈文字也被他視作足為「後世楷模」的書法墨蹟，是以在隨圖付梓之前，為求筆跡原貌能被忠實再現，他甚至自己親手鉤勒複製。⑮ 足見《泛槎圖》這部遊記亦不單只是以圖畫取勝而已，而堪稱是他與當代名家的書畫合璧之作。極富象徵意義的是，當此書第六集出爐之後，為他在1831年題跋的李嘉奎卻發現「集中名作如林，各體書法俱備，尚無清書」，

⑨ 張寶，《泛槎圖》，六集，頁69b-70a。

⑩ 關於這些題跋者身分及類型的初步考察，參見石繼昌，〈出版說明〉，收在張寶，《泛槎圖》，頁4-6。

⑪ 張寶，《泛槎圖》，三集，頁2b。

⑫ 張寶，《泛槎圖》，三集，頁3a。

⑬ 張寶，《泛槎圖》，三集，頁3a，70b-71a。

⑭ 張寶，《泛槎圖》，四集，頁88a-88b。

⑮ 張寶，《泛槎圖》，初集，頁2a；續集，頁1a。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頗覺美中不足，便特地將自己所題的楷體漢字律詩一首譯成滿文，書寫在左側，與右側的漢體相互對照（圖2），⑯ 具體而微展示了清代朝廷採滿、漢雙軌並行的特殊典制及書寫文化，以助《泛槎圖》一書能更全面包羅具代表性的清朝意象。

這數以百計為《泛槎圖》錦上添花的題跋者，一方面是被觀看的對象，但另一方面又形同此書第一線的觀眾群和傳播網。在閱覽之後，亦有人開始仿效張寶製作起自己的紀遊圖集來，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個案，包括了《花甲閑談》的編撰者張維屏、《願遊圖》系列的委製者張井（1776—1835）以及《鴻雪因緣圖》的畫主陶澍（1779—1839）和麟慶。不過，與張寶不同的是，此四人既非畫家，也非全職的旅行家。他們均是科舉出身的朝廷命官，長年為公務繁忙奔波，故所從事的旅遊活動以宦遊或差旅性質居多，而其紀遊圖亦是另請專業畫家代為繪製。

四人之中，張維屏接觸《泛槎圖》的時間最早，在1818年時即曾為此書的首集題詩一首。⑰ 他的詩才為當代所重，且自少即胸懷經世抱負，可惜仕途始終不順。於1822年成進士之前，曾四度會試落榜。接下來的十餘年遷轉於湖北、江西兩省，所任官職不外是知縣或知府之屬。最終仍因不堪官場惡習及體制的腐化而於1836年自行辭職，從此閒居家鄉廣州。⑱ 而完成於1839年《花甲閑談》十六卷，正是他回顧自己一生從求學入仕到退隱歸鄉的行跡摘要。全書共有圖32幅（表2），由廣東南海畫家葉春塘繪成，所選景點分布在粵、桂、江、浙、湘、鄂、冀等七省。當中有少量是屬於他家鄉的名勝，如廣州海珠寺。另有幾處是他任官前或辭職後專程造訪的觀光勝地，如羅浮山、杭州西湖、蘇州虎丘及廣西桂林等。其餘則多是趁赴考、任官或應召入朝之便而順道經遊之地，如北京、天津、黃河、洞庭湖、赤壁、黃鶴樓、廬山、白鹿洞書院等。

⑯ 張寶，《泛槎圖》，六集，頁43b-44a。

⑰ 張寶，《泛槎圖》，初集，頁58b-59a。

⑱ 張維屏生平履歷，參見其門人金菁茅所錄《張南山年譜撮略》，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珍藏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第136冊，頁565-5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稍晚於張維屏而獲觀《泛槎圖》者為滿洲鑲黃旗人麟慶。麟慶，姓完顏氏，乃金朝皇室後裔，1809年成進士，歷官至江南河道總督，且任期長達十年，為道光朝著名的河帥之一。今檢閱張寶《泛槎圖》諸集，雖見不到麟慶的題贈文字，但兩人結識的經過倒是明確紀錄在麟慶自撰的《鴻雪因緣圖記》當中：

> 壬午（1822年）八月服闕，得江南畫史張仙槎〔名寶，上元布衣〕書，并寄《龍門激浪圖》一幅，其言曰：「寶幼有畫癖，年二十即棄舉子業，客遊京師及楚越齊魯，每遇佳山水輒仿各家筆法，摹成三十六幅，號曰泛槎。憶自己巳（1809年）在法時帆〔諱式善，蒙古進士〕宅識荊，清才亮特，英氣逼人。後遊山左，路出泰安，謁尊大人，荷蒙資具，一登泰嶽，而寶願遊五嶽之志始遂。今聞宮允祥琴已進，特繪《龍門圖》奉寄為平地升雷之祝。」⑲

顯然，兩人初遇是在1809年張寶任禮親王幕僚之時，地點在北京文壇盟主法式善（1753—1813）的家中。後來張寶登泰山，曾事先尋求山東泰安知府的贊助，而這位知府正是麟慶的父親廷鎔。廷鎔於1820年過世，至1822年麟慶服喪期滿、返朝復官之際，即收到了張寶寄來的賀禮《龍門激浪圖》。這件作品事實上也就是《泛槎圖》續集裏的〈龍門激浪〉一圖（圖3）。麟慶獲得此圖後，不僅將之張掛於壁間，邀同儕共賞，還特地把它臨摹複製一過，改稱〈禹門激浪〉（圖4），收進《鴻雪因緣圖記》留念。⑳若進一步翻閱《鴻雪因緣圖記》，可發現此書直接摹鈔張寶畫樣之處，其實並不只〈禹門激浪〉一例。另外如〈禹穴徵奇〉（圖5）、〈永嘉燈塔〉（圖7）、〈燕子揚帆〉（圖9）、〈莫愁尋詩〉（圖11）、〈帝城展覲〉（圖13）等圖，亦是分別套用《泛槎圖》中的〈禹陵謁聖〉（圖6）、〈東甌弔古〉（圖8）、〈燕子風帆〉（圖10）、〈莫愁評畫〉（圖12）及〈帝城春色〉（圖14）而成。足見麟慶在製作《鴻雪因緣圖記》時，確實是把《泛槎圖》當成主要的參考範本和資料來源之一。

⑲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143。
⑳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143-144。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惟後出的《鴻雪因緣圖記》不但圖幅數量倍增，編排架構也比《泛槎圖》整齊嚴密。全書脫稿於1846年，分為三集，每集均有圖80幅（表3），首幅俱為麟慶的半身像，且各圖之後亦皆附有麟慶撰寫的記文。第一集記他從出生到卅九歲（1791—1829）的經歷，包括入仕前隨侍父親宦遊浙江、山東二省，以及登第後自己出任安徽寧國知府、徽州知府、河南潁川知府和開歸陳許道時的行蹤。第二集記他卅九到五十歲（1829—1840）的事蹟，包括他在河南按察使、貴州布政使、湖北巡撫及江南河道總督任內的行程。第三集則記其五十一至五十五歲（1841—1845）的活動，包括他革職返家後遍遊京畿名勝以及赴河南中牟黃河河工效力的旅程。綜觀他一生的旅遊範圍，跨冀、魯、豫、蘇、浙、皖、鄂、湘、貴等九省，雖不及張寶之廣，但亦已及於半個帝國。

至於陶澍和張井是如何結識張寶，現已無從確知，不過從兩人題跋均收在《泛槎圖》第六集這一點看來，他們遇見張寶的時間應當頗遲。陶澍生於湖南安化，1802年進士，官至兩江總督，張井是陝西延安人，1801年進士，曾任河東及江南河道總督達十年，可說和麟慶一般，同屬於常因四處巡閱而差旅頻繁的疆臣大吏。且由於轄區重疊，麟慶與陶澍之間其實頗多業務往來，彼此相識。所以兩人同樣採用「鴻雪因緣」一詞來為他們各自的紀遊圖譜命名，或許並非巧合。可惜陶澍的本子恐已失傳，目前僅能靠他留下的文字記載來一窺其貌。據陶澍自述，這套《鴻雪因緣圖》成於1828年，大致亦是按編年順序圖寫他由少至長約四十年的遊蹤，總計82幅，而選繪的地點都是「山水尤佳」之處。首先入畫的是其自幼熟稔的湖南家鄉風景，其次是任官京師時進出的皇宮內苑，最後則是他赴考求仕及宦遊各省時的閱歷，包括十二歲「浮資入湘，就試於有司」；年過二十北上參加會試，「泛洞庭，過江漢，渡淮黃，歷韓、魏、幽、燕之域」；卅歲後「使蜀，巡按江南，往來秦、齊、鄒、魯之郊」；四十二歲「備兵川東，旋臬於晉，藩於皖」；四十六歲「開府上江，旋移姑蘇」。至五十歲時，他已「於海，觀其一。於湖，觀其三。於江漢，於淮，皆窮源而竟其委。於五岳，則登岱望華，遙揖恆、嵩。惟衡在桑梓，尚未一覲。而於《禹貢》之九州，則足跡皆已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自認畢生所至，實已超過「身行萬里半天下」的地步。㉑

久任江南河督的張井，除了與陶澍熟識，㉒和麟慶亦屬前後任的關係。不過他的仕宦資歷雖與兩位同僚相當，也雅好名勝圖，卻對以名勝圖來紀生平宦遊一事興致不高。他倩名家繪製的《願遊圖》系列，包括錢杜（1764—1845）1823年繪《西湖泛艇圖卷》、朱鶴年（1760—1834）1824年繪《廬山瀑布圖卷》和1825年繪《黃山雲海圖卷》、胡九思1825年繪《雁蕩探奇圖卷》以及王功後1830年繪《峨嵋望雪圖卷》等，㉓畫的是西湖、廬山、黃山、雁蕩山及峨嵋山，但這些家喻戶曉的名勝其實全都只是他此生想遊而未遊的地方。換言之，《願遊圖》在概念上較近似傳統用來為無法親履其地者畫餅充飢的「臥遊圖」。它一方面訴說著張井畢生未能實踐的旅遊夢，另一方面也凸顯了親身環遊天下名區之大不易。值得一提的是，曾為《泛槎圖》題跋的姚元之（1776—1852），㉔後來也為張井在《雁蕩探奇圖》上題詩（圖15），首句「有人昔從雁蕩來，為言雁蕩天所開」下方，有小字自注云：「張君寶遊雁蕩歸來，為余述之」。可知不單是張井，姚元之本身也沒到過雁蕩，他對此山奇景的讚美其實是根據張寶的描述而來。顯然，張寶的

㉑ 陶澍，〈鴻雪因緣圖記〉，《陶文毅公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1503冊，卷34，頁384。

㉒ 張、陶兩人交情，見陶澍，〈二竹齋詩文集序〉，收入張井，《二竹齋詩鈔》（清代詩文集彙編5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699-700。

㉓ 錢杜《西湖泛艇圖卷》，刊載於Paul Moss, *The Literati Mode: Chinese Scholar Paintings, Calligraphy and Desk Objects* (Hong Kong: Andamans East International, 1986), pl. 32. 圖後有吳嵩梁1824年跋，稱此卷是張井的《願遊第一圖》，又說張井「願遊者尚多，如廬山、雁蕩、黃山皆有圖」，故可確定朱鶴年和胡九思所繪圖卷亦屬《願遊圖》系列。惟王功後一圖乏文字記載佐證，無法確定是否為《願遊圖》之一，姑存之以備考。除錢杜之圖藏地不詳，其餘諸圖均藏於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圖版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頁228-229，233-234，236。另據陶澍〈二竹齋詩文集序〉的記載，張井曾以《願游天下名山十圖》求題，可知願遊圖總共應當有十幅，見張井，《二竹齋詩鈔》，頁700。今查陶澍詩集，當中有〈題張芥航河帥願游名山圖〉詩三首，分別詠鄧尉山、天台山及武夷山，見《陶文毅公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1504冊，卷58，頁71。

㉔ 張寶，《泛槎圖》，初集，頁62a。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親遊體驗已成了時人眼中可靠的名勝地理資訊來源。

上述幾套道光時期的紀遊圖集，不管是記畫作主人的實際遊踪，還是錄其無緣親訪的觀光勝地，大抵都可歸入「天下名勝圖」的範疇。這種類型的作品意在蒐羅散布於中國不同省分的景點，涉及的地理疆域較常見的單一地區名勝圖為廣，要一一親訪原已不易，若又需沿路對景寫生，則更是難上加難。故名勝山水圖雖自宋代便已成形，但據實景繪成的天下各地名勝圖，歷來並不多見。張寶就曾針對此一狀況進行分析：

> 自唐、宋及今，代有名家，求其遊遍天涯，將各處名勝真形寫入圖畫者，幾於百不得一。是豈古今人之雅不願為耶？蓋自有故也。或有家計之累而不能任意遠行，則圖之難成者一。或五官百骸之間有一暗疾，不能濟勝揮毫，則圖之難成者二。或英年勇於前往，而老大漸有退心，則圖之難成者三。或無諸名士品題鑲佩成冊而聲價不高，則圖之難成者四。㉕

在他看來，壯遊寫生之舉若無充分的財力、體力、毅力以及名人的加持背書，頗難成事。而此事之稀罕，王泉之為《泛槎圖》撰序時也曾論及：

> 「州有九，遊其八」，此嚴夫子語也。然未聞其摛華掞藻，繪五嶽真形於圖中，以著偉辭，論者不能無缺憾焉。夫名山之著者八，落蠻荒三，隸中國五，而遊之遍者，恆不數數覯。巡狩之典，肇自有虞。羣牧須瑞，不及中嶽。著封禪者，七十二君，泰山以外無聞。漢以灊為南嶽，而衡山未至。以天子六飛之疾，即五嶽有至有不至，況周行天下名山大川，欲一一譜之於圖，鑿險縋幽，雕琢章句，已快夫登臨，雖古之圖靈光、銘劍閣者不過焉，不綦難乎。㉖

他首先提到漢代文學家嚴忌遊踪廣遠，幾乎行遍天下九州，可惜僅空留辭賦，未曾形諸圖畫。接著王氏又以古代天子巡狩封禪活動為例，指出過去帝王即使坐擁頂級的交通工具，但實際行封禪禮時，卻沒有一位得以遍訪五

㉕ 張寶，《泛槎圖》，六集，頁55a-55b。
㉖ 張寶，《泛槎圖》，續集，頁1b-2b。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嶽。而身無過人配備的平民張寶，竟能於五嶽之外，又廣遊其它天下名勝，甚至獨力將之一一親自譜寫成圖，放眼古今，不得不說是罕見其儔。

就現存實例觀之，張寶的壯遊寫生活動確實是史上少有，但此種嘗試圖錄天下各地名勝的豪舉卻絕非由他肇端。早在十七世紀時就出現過一波編繪天下名山的風潮，十八世紀此風中衰，爾後在張寶的帶動下，至十九世紀前期儼然又形成另一次高峰，一時之間有前述多部規模大小不一的作品問世。而無論在概念或形式上，這批嘉、道年間的作品都曾受前代先例的影響。惟在吸納淵源自十七世紀的天下名勝圖傳統之際，它們也發展出與過去迥然有別的骨幹架構及血肉面目。為了要釐清其間遞嬗演變之跡，接下來實有必要先對十九世紀以前天下名勝圖類型的發展大勢進行梳理。

二、從「帝國化」到「私家化」：天下名勝圖譜在清代的演變

名勝圖在宋代發跡之初，流行最廣的類型即為「地方八景圖」，如《瀟湘八景圖》、《西湖十景圖》和《北京八景圖》等一地多景式的套裝圖組均屬此類。入明以後，蘇州、金陵、新安等地方畫派先後競起，在鄉土意識的驅策下，所製作的名勝圖多描寫江南及徽州地區的風光，如虎丘、太湖、棲霞山、白嶽、黃山等。且這些作品也類似地方八景圖，主要以展現一郡一邑或一山一水的景觀為務，涉及的地域偏狹，大約不出一般府州縣地方志或山水專志所設定的空間範圍。這種單一景區或地方鄉邑型的名勝圖到了明代中晚期跨省長程旅遊活動大興之後，顯然已不敷所需。據傅立萃針對此際新興的「名山圖」類型所作的研究顯示，為因應當時壯遊之風，一種銳意打破區間疆界、將分散於中國四方不同省分的奇山大水盡收筆端的名勝圖就此嶄露頭角，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謝時臣的《天下四大景》、《海內四奇景》、《乾坤四大景》系列，以及宋旭的《五嶽圖》等。㉗ 繼謝時臣和宋旭之後，

㉗ 傅立萃，〈謝時臣的名勝四景圖—兼談明代中期的壯遊〉，《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期（1997），頁185-222；Fu, Li-tsui Flora, *Framing Famous Mountains: Grand Tour and Mingshan Paintings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人不僅對蒐羅天下奇景於指掌之間的興趣有增無減，而且還進一步透過當時蓬勃發展的坊間商業印刷出版，將過去慣常以卷軸或冊頁形式來張掛或賞玩的山水圖刊印成書，既可大量複製，又能廣為流傳，遂使十七世紀成為中國集錦大觀式名勝山水圖譜製作與消費的第一個高峰期。重要作品大致可歸為兩類：第一類是旅遊書插圖，如1609年楊爾曾所輯《海內奇觀》、1633年出版的《名山勝概記》等；第二類是類書或百科全書插圖，如首刊於1607年的王圻（1530—1615）《三才圖會》、1613年付梓的章潢（1527—1608）《圖書編》等。㉘

清代初期，坊間出版業雖然盛況不再，但曾在晚明旅遊書及類書中大放異彩的宏觀式名勝集錦圖譜並未立即消失，例如康熙朝編修的類書鉅構《古今圖書集成》，便設有「山川典」這個系統化介紹中國全境山水的專章，綴以風景版畫213幅，將天下名山奇景一一圖呈。㉙ 然而諷刺的是，就在《古今圖書集成》發皇晚明寰宇搜奇、海內探幽之風的同時，它也成了此一流風的絕響。隨後問世的地志圖譜，即使山川景象依然誇侈競麗、紛繁如昔，卻再也沒有一部可以在地理空間的廣度上或地貌奇詭的程度上與之匹敵。誠如巫仁恕在比較明清兩代旅遊文化發展時所言，清人旅遊風氣之盛及遊蹤之廣，較諸晚明，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晚明流行像《海內奇觀》一類的大部頭、圖文並茂的旅遊書，到了清代卻後繼乏力，取而代之的是個別的山川地理專志的大量出版。㉚

不過，明代盛極一時的寰宇搜奇式山水圖譜在十八世紀初退場之後，天下名勝圖的編繪工程其實並未隨之消失，而是開始出現重大轉型，不復以類

㉘ 目前這幾部晚明著作中的名勝圖，僅《海內奇觀》已有學者進行研究，見Lin Li-chiang, "A Study of the *Xinjuan hainei qiguan,* a Ming Dynasty Book of Famous Sites," in Jerome Silbergeld, Dora C. Y. Ching, and Alfreda Murck, eds., *Bridges to Heaven: Essays on East Asian Ar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en C. Fo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779-812.

㉙ 關於此書「山川典」中插圖的綜合研究，參考呂季如，《《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山水版畫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㉚ 巫仁恕，〈清代士大夫的旅遊活動與論述—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期（2005），頁235-285。

臺灣大學藝術圖書資料庫

書或旅遊書為圖像載具。這一新型態的代表作即為《南巡盛典》。此書刊行於1771年，是一部紀念乾隆皇帝前四次南巡壯舉的官方實錄彙編，且是在皇帝親自授權之下，由兩江總督高晉匯集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等南巡所經四省的相關資料編纂而成。依當時《四庫全書》的分類，它是屬於「史部政書類」，與被歸入「史部地理類」的《海內奇觀》、《名山勝概記》以及收在「子部類書類」的《三才圖會》、《圖書編》不屬於同一類。除了連篇累牘的檔案文獻，這部紀錄南巡儀典的政書還附有精緻華麗的山水版畫155幀，收在特闢的「名勝」專章之中，無疑是繼《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圖典之後，一套最具規模的跨省山水勝景圖譜。雖然從地理疆域的涵蓋範圍論，僅圖繪四省佳麗地的《南巡盛典》遠不及搜盡天下奇峰的《古今圖書集成》或晚明旅遊類書，不過在概念上已算是當時最接近十七世紀大觀式名勝圖譜的例子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古今圖書集成》還是《南巡盛典》，兩者都不再如晚明類書和旅遊書那般出自私家編撰或由坊間出版，而全都是在皇帝的監控下，由朝臣主持編纂工程，然後交由宮中武英殿刻書坊刊印。換言之，十七世紀以後，大觀式名勝圖譜並未真正退出歷史舞台，只是已遭官方大舉收編，類似製作幾乎全由民間私修私印改為朝廷官修官印，甚至最後連載具型態也由類書一轉而為政書，政治意味更加濃烈。

這一編輯體例及出版模式的轉變，暗示了中國此時不僅早已江山易主，似乎就連圖寫並展示天下江山大觀的主導權也被迫易手，而《古今圖書集成》和《南巡盛典》這兩部皇清欽定的圖文彙編，其實正是名勝山水在十八世紀逐步遭到清廷「帝國化」或「宮廷化」的最佳視覺見證。兩書所呈現的山川風貌均具有典型清宮殿版風格富麗堂皇的氣象，整體山石佈局整飭宏茂，而皴紋線條則綿密工緻，不論是自然或人為景觀，一切都顯得井然有序。除了圖像風格與宮廷院體同步之外，《南巡盛典》還進一步在固有的名山勝水間大量添繪清代增築的「行宮」、「座落」、「御書樓」及「御碑亭」等人工建置，這些其實全是康熙至乾隆朝百年間地方大吏為了迎駕邀寵而在南巡路線上廣造的皇帝休憩所及御書碑刻。由於這一系列應清帝出巡而生的行宮建築和紀念碑，多樹立於遊人如織的觀光勝地中或商旅熱絡的京杭大運河沿線要埠上，挾天子之威，轉瞬即成新興地標，不僅移易了一方地貌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景觀，更重塑了當地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形象。㉛ 據Tobie Meyer-Fong、王正華、馬雅貞等多位學者提出的城市個案研究，南巡確實曾為清帝駐蹕多次的江南名城如揚州、蘇州等地帶來多重的影響。其一是當地官紳在籌備南巡時直接對市容景觀和游憩景點進行改造；其二是中央及地方政府合力將該地固有名勝圖像加以改版或全面更新，以紀錄或顯揚新興的南巡史蹟和地標；最後，這些受南巡洗禮的官方新版名勝圖像又向下滲透到民間製作的版畫或年畫之中，成為供大眾消費的商品。㉜ 百姓不僅可在出門遊山玩水時一睹皇帝和北京宮廷的「分身」，亦即遍布各地的御碑及行宮，也能在家觀賞繪有南巡地標的名勝風景圖。可說盛清時期的實體遊憩空間以及觀看或再現勝景的角度，多少都被南巡等「皇帝的壯遊」重新定義了。

繼《南巡盛典》之後，清廷曾於1812年仿照其體裁編成《西巡盛典》一書，以紀念嘉慶皇帝從北京西行至佛教重鎮山西五臺山避暑朝聖的典章盛事。書中雖仍有名勝圖，但已遭到縮編，不再如《南巡盛典》一般開闢「名勝」專章來收錄，而是連同行宮、座落、尖營等建築地盤圖24幅以及路程地圖28幅一齊併入「程途」一門之下。㉝「程途」這一項目本來也是出自《南巡盛典》，原先與「名勝」門平行分立，是專為收錄輿圖式的巡行交通路線

㉛ 清帝利用巡幸四方、廣建行宮御碑以及大量繪圖出版等手段來為各處名勝烙上帝王或宮廷印記的過程，即文中所謂天下江山勝景的「帝國化」。由於此一發展過程在筆者的博士論文中已有專章討論，此處限於篇幅，僅能作粗略說明，詳細分析論證，參見拙著Yun-chiu Mei, “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08), pp. 71-111.

㉜ Tobie Meyer-Fong,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Tobie Meyer-Fong, “Seeing the Sights in Yangzhou from 1600 to the Present,” in Ko-wu Huang ed., *When Images Speak: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Cultural Mapping in Modern China*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2004), pp. 213-251；王正華，〈乾隆朝蘇州城市圖像：政治權力、文化消費與地景塑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期（2005），頁115-182；馬雅貞，〈中介於地方與中央之間：《盛世滋生圖》的雙重性格〉，《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4期（2008），頁259-322。

㉝ 彭齡等編，《西巡盛典》（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卷13-16。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資料庫

圖而設。㉞ 如今《西巡盛典》只保留「程途」一門，而將名勝圖以從屬之姿併入其下，不無厚此薄彼之意。且「程途」門當中總共有圖69幅，畫名勝者不過17幅，不僅數量和比重大不如前，繪工品質亦明顯下降。故此書一出，實亦宣告了宮廷殿版稱霸天下之局的結束，此後朝廷對大觀式名勝圖譜的製作出版便不復聞問。

就在十九世紀初宮廷殿版山水圖生產成強弩之末時，以《泛槎圖》為首的紀遊圖集趁隙而起，圖寫帝國江山勝概的工程又如晚明一般轉入私家之手。不過，同樣是出於私修私刻，嘉、道年間的名勝圖譜卻無意再重拾《三才圖會》、《海內奇觀》、《名山勝概記》等晚明流行的類書或地理志書之體。雖說這些晚明書籍所附名勝圖是當時旅遊風氣大盛之下的產物，且畫面上也常綴有正在進行遊覽活動的點景人物，但所圖所寫並非某一特定人士的特定旅程。換言之，這些圖作既不含紀事成分，也不帶個人色彩。反觀《泛槎圖》等嘉、道時期作品，無論選地或取景均依畫主個人遊跡而定，此種編纂體例或敘事結構，毋寧較接近以紀錄乾隆皇帝南巡行踪及沿途景觀為目的的《南巡盛典》名勝圖和程途圖。除體例架構之外，《南巡盛典》的圖樣乃至其殿版風格也曾被多部嘉、道時期的名勝圖譜直接挪用。例如《泛槎圖》的〈翠微環眺〉（圖16），即是以《南巡盛典》的〈清涼山〉（圖17）為底本。而較諸《泛槎圖》，《鴻雪因緣圖記》援用宮廷殿版山水圖像之處又更多，如〈翠微問月〉（圖18）、〈寄暢攀春〉（圖19）和〈孔林展謁〉（圖21）三景，分別是摹自《南巡盛典》的〈清涼山〉（圖17）、〈寄暢園〉（圖20）和〈孔林〉（圖22）；至於〈靜寄瞻樓〉一景（圖23）則無疑是取自乾隆朝另一部殿版代表作《欽定盤山志》中的〈半天樓〉（圖24）。在借稿之餘，《鴻雪因緣圖記》全書的圖像風格富麗精謹，其實也頗具殿版的格調。

除了《鴻雪因緣圖記》，刊行於1838年的劉愔自繪紀遊圖譜《悟蘐亭畫稿》也明顯繼承了殿版風格。劉愔是湖南寧鄉縣人，曾以諸生捐官，獲山東聖廟啟事一職，遂就近遍覽孔林、泰山等名勝，並繪成《東郡小遊圖》留

㉞ 高晉編，《南巡盛典》（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卷92-93。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念。後來他北上京師出示畫稿，頗受大學士覺羅德厚（1814年進士）賞識。德厚不僅將他延攬至門下數年，還進一步推薦他到宮中如意館試畫。測試過關後，劉愔又繪製一套《瀟湘八景圖》進呈皇帝，因而被任命為內廷南苑供奉官。可見其畫作中展露的宮廷之風，當非偶然。但一如張寶，劉愔其實生性好游，不樂仕進，最終即以母親年邁為由乞歸故里。㉟ 他的《悟蘐亭畫稿》亦類似《泛槎圖》，主要在紀個人生平曾經親遊的佳山勝水。全書共有圖86幅（表4），前35幅畫的是其家鄉湖南地區的名勝，當中收錄一套《瀟湘八景圖》，或許就是他進呈御覽的本子。第36至45幅描繪其遊覽山東的經歷，即上述的《東郡小遊圖》。第46至86幅則是畫他從北方南返歸鄉時的遊踪，所繪名勝及於蘇、皖、贛三省。劉愔這套畫譜除了具有宮廷山水版畫佈局宏富、線紋端麗的特質外，還處處可見《南巡盛典》的遺痕。例如〈玉符山〉一景（圖25），乃直接套用《南巡盛典》的〈靈巖寺行宮〉（圖26）。再者，圖幅的版面格式也是仿效《南巡盛典》「名勝」門而來，不僅每一圖之前均另闢半頁來標示所繪景區的名稱，並選用篆隸之體來書寫，同時畫上也常以小字標注該景區中的各個景點。最後，圖譜押尾的〈江景〉34段（圖27），採長卷形式描繪從江蘇蘇州至湖南長沙的水路沿線山川城邑及港汊驛站，可說是一件具交通指南功能的長江水程圖。此種在名勝專圖之外又另畫路程圖以為輔的體例，顯然亦是取自《南巡盛典》（圖28）。

然而在援引殿版山水圖形制的過程中，嘉、道光年間的私修名勝圖譜並未完全照本宣科。例如前舉《泛槎圖》和《鴻雪因緣圖記》兩書中的南京清涼山圖，乍看之下不過是《南巡盛典》〈清涼山〉圖的機械化翻版而已，但經仔細比對之後，可發現這兩幅十九世紀的仿本均有志一同在山頂翠微亭旁添繪了一組賞景遊客。同樣地，當《鴻雪因緣圖記》依據《欽定盤山志》摹繪盤山行宮靜寄山莊半天樓一景時，也在圖幅右下角加畫了兩名在行宮圍牆外引頸瞻樓望月的遊客。按麟慶所撰圖記的提示，此二人正是麟慶本人以及

㉟ 劉愔傳記資料，見周震麟修，劉宗向纂，《民國寧鄉縣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先民傳五十八，清三，頁284；其入都遊於覺羅德厚門下之事，參見劉愔，《悟蘐亭全集》，收在《中國古畫譜集成》（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第8卷，頁5-6。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他的隨行幕僚畫家陳鑒。㊱ 可說這些點景人物的尺寸雖小，卻帶有個人肖像的性質以及紀遊述事的功能。而回顧清廷生產的殿版名勝圖，一般均刻意不畫這類點景人物，山水之中往往空無一人，即便是專為紀錄皇帝親巡行踪的《南巡盛典》和《西巡盛典》圖像，亦不見天子本尊或扈從人員的身影。皇帝在帝國江山中持久不滅的存在感以暨皇威遍及天下的意象，並非靠天子個人的血肉之軀來體現，而是藉由更具恆常感的各地行宮及御碑等體制化的朝廷建置來傳達。從這些以宮廷式硬體建設取代皇帝肉體人身的巡行山水圖中，我們一方面見識到清帝如何透過個人頻繁的親巡行程來將皇權象徵物大肆嵌入地方名勝之中，另一方面卻又看到他們銳意抹殺自己趁巡行之便四處遊山玩水的面目，企圖將這類親巡活動客觀化成一種超乎個人私心私念的儀典制度。因此，《泛槎圖》、《鴻雪因緣圖記》等在取法殿版山水圖之際所增繪的點景人物，形貌雖微不足道，卻可說是清代天下名勝圖譜由「帝國化」走向「私家化」的起點。

此處所謂的「私家化」現象，不單是指天下名勝圖譜的生產型態再度轉為私修私刻，或是名勝山水中的點景人物被賦予個人肖像色彩，還包括畫主有意將原本以搜奇探奧為目的的名勝風景圖轉成一部鉤勒個人或家族事蹟的外史別傳。惟嘉、道時期的名勝圖譜雖都有這種私家化的傾向，但每一部試圖揭露的自傳或家乘資料仍有多寡深淺之別，有的僅彰顯故鄉風光或自己生平的經歷，有的則進一步去挖掘烙印在山水地景中的家族記憶及祖先歷史遺跡。其中，《悟鄦亭畫稿》的私家化程度最淺，除了記述劉愔生平遊踪外，只靠收錄大量家鄉山水來顯示畫主個人的來歷出處。全書86圖中有35幅是畫其在籍地湖南省的名勝，比重達四成，不可謂不高。35幅湘省名景中的最後六景，即湯泉、稽架山、優鉢泉、麒麟峰、謝英臺和獅顧，均隸屬於劉愔的本邑寧鄉縣，可說是地緣上與其居址更親近的「家山」。至於壓軸的獅顧則更宛若其自家後院，坐落位置就緊鄰在他所築的園亭「悟香亭」之北。

一如劉愔，張寶也利用家山圖來強調自己的根源。前曾提及，他的《泛槎圖》第四集基本上就是其家鄉南京的名勝專輯。在這套南京圖像之中，和

㊱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7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寶個人最密切相關的亦為最末一幅，即描摹其父母合葬墓的〈大山廬墓〉（圖29）。根據張寶的自題，圖中所畫實際並非公認的南京名勝，而是嘉慶元年他在大山之陽為亡父亡母覓得的一塊風水地，墓旁還設有茅屋數椽及墓田數畝以供祭掃。同時，他也期望透過圖繪留影，能讓張家「後世子孫毋失先人窀穸之所」。顯然張寶刻繪這樣一幅墳山圖，目的亦已不再是紀遊或紀勝，而是有意將之用作一種家族慎終追遠之具。除了圖錄張氏的塋地陰宅，《泛槎圖》也留存了其南京祖居的影像，如收在第三集的〈家園宴樂〉（圖30），所繪便是張寶六十歲時在老家舉辦壽宴的情景。在畫上的自題詩中，他不僅記述闔家團聚慶生的天倫之樂，還透過「三山舊宅欣開讌」、「老妻貞女善持家」等詩句下方的註語來揭露自己家計和門風的近況。前一句提到的宴會地點「三山舊宅」，指的即是張家位在南京三山街的祖宅。這片祖產曾一度遭到典賣，近日才由張寶的子女贖回。後一句則旨在褒揚其次女月姑的貞德及孝行。此女本有婚約，但自未婚夫隨父遊粵西而失聯之後，她便決定終身留在父母身邊照料家計，遂減輕不少張寶遠遊時的後顧之憂。

比起《悟蘐亭畫稿》，《泛槎圖》無疑承載了更多有關畫主個人及家族史的資料，不過若與《鴻雪因緣圖記》相較，則依然顯得零星。無論表述手法或資訊內容，麟慶這套圖譜均堪稱是當時最豐富而全面者。首先，它也如前兩書一般含有高比例的家山圖。這些描寫麟慶家鄉北京風貌的圖像，大致集中在《鴻雪因緣圖記》第三集下冊，當中還包括了多幅麟慶的新居半畝園以及祖塋家墓圖。半畝園在紫禁城外東北隅弓弦胡同內，清初以來經多次轉手，至1841年始被麟慶購得並加以重葺，而收在圖譜中的〈半畝營園〉便扼要介紹了此園的來歷和修復過程。㊲ 除此之外，書中另有〈雙仙賀廈〉、〈拜石拜石〉、〈鄦嬛藏書〉、〈近光佇月〉、〈園居成趣〉、〈五福祭神〉、〈退思夜讀〉及〈煥文寫像〉等圖，㊳ 亦是以半畝園內的建築或造景為描寫對象，所繪分別是福壽廳、拜石軒、鄦嬛妙境、近光閣、瀟湘小影、退

㊲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603-605。

㊳ 此八圖見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606-608，642-644，677-679，686-688，752-754，758-7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思齋、五福堂和玲瓏池館等。諸圖多為園林一角的特寫或廳堂院落的內景，唯獨〈近光佇月〉（圖31）繪有園外景觀。此圖右半邊的樓臺乃半畝園的最高處，由此向左望去，紫禁城大內門樓、景山五亭以及瓊島白塔等皇苑地標便近在咫尺，這也是此樓被命名為「近光閣」的理由。這幕皇宮內苑與臣民私園相倚對望的景像，固然寓有麟慶向清室表忠頌恩的心跡，但將禁內之景圈入自己的家園形像之中，卻也不無炫示完顏氏作為特權之家、朝夕得近天顏的意圖。

此種將國恩與家慶相結的意象不僅出現在麟慶的家園圖中，也可在其祖塋圖中見到。《鴻雪因緣圖記》所收完顏氏墓圖有〈賜塋來象〉、〈仙橋敷土〉、〈架松卜吉〉和〈房山拜陵〉等四幅。㊴〈賜塋來象〉是畫順治皇帝賜予麟慶七世祖鑲黃旗滿洲佐領達齊哈的塋地，位在北京安定門外三里，後來麟慶的六世祖刑科給事中阿什坦、五世祖內閣侍讀學士和素以及高祖御史白衣保也葬於此處。1843年麟慶率子孫前來謁墓時，適有兩隻內府馴養的大象經過，被族人視為吉兆，麟慶遂因此繪圖紀念。〈仙橋敷土〉畫的是麟慶的曾祖父兵部侍郎期成額、祖父河南布政使完顏岱以及父親廷鎔的塋地，位在北京東直門外東北十三里的酒仙橋。〈架松卜吉〉所繪為麟慶替自己預備的生壙，地點在北京廣渠門外東南三里處的架松。三圖的題記依世序概述了麟慶一族七代的官爵、功業及葬所，既可視作是一分家族簡譜，亦頗能顯揚自家世代簪纓、屢蒙恩榮的傳統。至於〈房山拜陵〉則是描繪1845年麟慶率二子至大房山參拜金太祖睿陵及世宗興陵的事蹟。麟慶在圖記中特別提到自己是金世宗旁支二十四代孫，金代皇陵在他眼中其實已非單純的歷史古蹟，而是完顏氏的祖陵。又說清室與女真金朝系出同源，故從建國以來也對房山金陵禮遇有加。如順治和康熙兩帝均曾為其撰寫紀念碑文，乾隆皇帝更於1753年親自謁陵，並命金裔完顏氏子孫陪祀，當時麟慶的曾祖父便曾躬逢其盛。後來朝廷編輯《八旗氏族通譜》，完顏氏本列在第二十八卷，乾隆皇帝又下特旨將其改列第一卷，遂被金裔視為莫大榮寵。可說麟慶藉由拜謁金陵，一方面追溯了自己族裔的源流，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完顏一氏在清代族群

㊴ 此四圖見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609-617，755-7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策及八旗體系中備受皇帝優禮拔擢的一段舊史。

除了直接以家園和祖塋圖來表述家史，麟慶也間接透過外地名勝來紀念祖先的事功與遺德。如〈虎邱述德〉所繪的蘇州虎丘，雖是天下最熱門的觀光景點之一，但1809年麟慶到此一遊時，卻不是單純隨俗湊熱鬧，而是抱著「緬懷祖德」的目的而來。他的五世祖和素在康熙年間官內閣侍讀學士，曾扈從南巡，沿途和詩均能稱旨，行至虎丘時，聖祖不僅親自賜饌，還當面書寫紀遊詩相贈。這件御賜詩書蹟後來便成了麟慶的傳家之寶，被慎重珍藏在完顏氏的宗祠之中。㊵ 又如〈闕里觀禮〉所繪為歷來士人嚮往一窺堂奧的曲阜孔廟，1816年麟慶來訪時，也和大多數謁廟者一樣，頗為崇閎壯麗的廟庭規制所懾，然而與一般遊客不同的是，麟慶在讚嘆之餘又多了一分屬於個人家族的驕傲，因為此一廟庭規制正是他的叔高祖留保於雍正七年奉皇帝之命督修而成的。㊶ 而鄰近闕里的另一處全國熱門旅遊勝地東嶽泰山，其實亦有麟慶親人留下的手筆。據〈海嶽浴日〉一圖所記，1816年他到泰山腳下的泰安府探親，不僅見到了在當地任官的父親，還得以在泰山山腰的著名景點壺天閣上觀賞到父親書寫的楹聯，上下聯分別是「登此山一半已是壺天」，「望絕頂千重尚多福地」。㊷ 此聯至今猶存，其上並有紀年款「甲戌秋月」、「知泰安府事長白廷鎔敬題」等字樣（圖32），可知是1814年廷鎔在泰安知府任內之作。同樣在任官轄區留下個人印記的麟慶先人還有其叔高祖完顏偉及祖父完顏岱。完顏偉在乾隆初年以東河總督權篆南河時，曾於江蘇海安廳雲梯關外的禹王宮後興建一座三層高樓以望海，此即〈平成濟美〉所描繪的平成臺。1834年麟慶甫任南河總督，也趁巡視海口之便一瞻這座先人所建的華偉樓臺，並為其書寫楹聯。㊸ 至於完顏岱從宦事蹟，則見載於〈元妙尋蕉〉（圖33）。此幅所繪為1832年麟慶重訪兒時舊遊地玄妙觀的情景。此觀始建於元代，位在河南南陽城北，麟慶幼年隨祖父赴南陽知府任時，曾在觀中遭遇教亂，靠道士及時將他藏入蕉樹中而躲過一劫。但對麟慶來說，

㊵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90。
㊶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121-122。
㊷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111。
㊸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400-401。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除了當年救命的道士與蕉林之外，值得追尋留念的還有圖中一座豎立於正殿前的石碑，此碑即是他在記文中特別提到的《完顏岱德政碑》。㊹

上述這類透過地景追憶先祖宦蹟的例子在《鴻雪因緣圖記》中雖不少，但條記麟慶本身仕履經歷者更占壓倒性多數。例如〈京兆報捷〉及〈午門釋褐〉是記1809年他考取進士並至午門前謝恩的經過。㊺〈史館承恩〉及〈史宬啟匱〉記1821年他充任清仁宗實錄纂修官，既得到御賜禮物，又能一窺皇史宬石室秘藏的實錄玉牒。㊻〈歙嶺訪案〉及〈潁川靖盜〉是記他從北京外放為地方知府的治績，前者為1823年任安徽徽州知府時易裝私訪棚民疾苦並調查訟案之舉，後者為1824年調河南潁川知府後緝捕教亂餘黨及地方惡霸之事。㊼〈黔疆閱武〉、〈苗猓獻忱〉兩圖所記均為1832年他升任貴州布政使後治理邊省的業績，前幅畫他在貴州大校場典試武闈並校閱官兵，後幅則畫苗民餽贈土儀以感謝他的利民政策。㊽ 1833年他再陞為湖北巡撫，有〈荊營驗馬〉一圖繪他奉旨到荊州滿營清點馬匹及旗庫銀兩數目。㊾ 而在1834至1842年擔任江南河道總督期間，第一項被頻繁圖寫的治績便是他在蘇北的河防措施。如〈天然定誌〉記1834年他重定徐州府黃河南岸天然牐的放洪標準；〈貞應培堤〉記1835年他所興築的高郵州貞應祠月堤；〈湖心建塢〉記1838年他在洪澤湖中營建救生船塢；〈智信宣防〉記1840年洪澤湖異漲，他緊急啟放山盱智信二壩、義禮二河及高郵四壩以洩洪；〈豐蕭啟埂〉記1841年黃河決堤，他在蕭南和豐北兩廳所進行的河道挑挖工程；〈中河移塘〉記1842年黃河再度漫口，淤塞了中河漕道，他趕緊以灌塘之法濟運，讓漕船得以如期回空。㊿ 除了應付河患，他在河督任內末期還遭逢鴉片戰爭，於是預

㊹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319。
㊺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75-77，80-82。
㊻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150-152，139-141。
㊼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179-181，213-215。
㊽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352-354，358-560。
㊾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385-387。
㊿ 此六圖見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396-398，408-410，455-457，506-508，546-548，579-5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防英軍進犯江北也就成了他此時紀事的第二項重點。如〈金山操江〉及〈石公驗礮〉記他1840年赴鎮江加強長江江防，先登金山操江樓校閱水師，再至石公山查驗鐵砲；〈葦營合操〉記他為了防護海疆，於1841年至海州葦蕩營選兵團練；〈江北督師〉畫1842年他在揚州蜀岡香阜寺前巡閱江防的情景；〈汎舟安內〉則是畫1842年江北紳商風聞英軍進逼，多舉家遷徙至清江浦避難，趁火打劫的土匪和哄抬物價的惡棍亦隨之蜂起，麟慶遂設防堵總局，一邊緝匪一邊平糶。[51] 自1843年革職返京後，麟慶還曾奉命前往河南中牟黃河決口處協助修堤工程，〈料廠聞捷〉、〈引河搶紅〉、〈中牟合龍〉三圖所繪正是他在工地監督物料採買、挑挖引河及接築大壩的情況。[52]

麟慶這群紀個人宦業的圖像固然多以特定地理實景為場景，不過除了鎮江金山、揚州蜀岡和高郵貞應祠（即露筋祠）為夙負盛名的旅遊景點，其餘地點不是官廳衙署，就是軍營駐地或河防重鎮。凡此，均非時人眼中的觀光勝地或歷史古蹟。再者，圖中所描繪的各項活動，包括登科入朝、查案緝匪、閱武治河等，亦與尋幽探勝無關。換言之，它們實質上已與傳統名勝圖大異其趣。若回頭檢視前述十七至十八世紀出版的多種名勝圖譜，當中也確實看不到此類圖像的踪影。雖說麟慶這組圖像已脫離了固有名勝圖的範疇，卻絕非遲至道光時期才發展出來的圖像類型，而是承繼了另一種與紀宦表功更直接相關的圖像系統，即「宦蹟圖」的傳統。

三、紀勝與紀宦之體的合流：宦蹟圖在清代的新發展

宦蹟圖是一種表述官員傳記履歷的敘事畫，除描摹個人一路從讀書受教、科舉登第到出任官職的仕宦生涯外，也常兼述其家庭狀況、讌遊行樂，乃至夢兆奇遇等，所紀事蹟類型可說與《鴻雪因緣圖記》如出一轍。而從明到清，這類畫作不僅傳世之蹟數量可觀，見載於詩文集等文獻中的個案更多，其流行的程度，當不下於同時的名勝圖類。惟因繪製者多非名家，過去

[51] 此五圖見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497-499，500-502，537-539，573-575，576-578。
[52] 此三圖見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695-697，698-700，710-712。

臺灣人博碩士論文暨美術期刊資料庫

並未受到收藏單位和學界重視，相關研究至今依然頗為零星。據現存圖文資料看來，最普及的類型是專記單一事蹟的「專題式」紀宦圖，有的僅截取事蹟片段，以單景單幅呈現，亦有採紀事本末體，以分景多幅的形式來曲盡事件全貌者。至於所記事蹟則以登進士第後參加禮部所辦的瓊林宴或恩榮宴最為常見，如《瓊林醉歸圖》或《恩榮圖》之類。[53] 其次，紀念父子或兄弟同朝為官、一家三代或四代同受朝廷恩封官爵、以及考績優良獲頒誥敕之類的畫例也不少。[54] 而無論是登科或受封贈，對無法立下非凡勳業的官員及其家族來說，或許是畢生唯一可以拿來光耀門楣之事。不過就當時官場的常態論，這類事蹟其實頗為司空見慣，是許多簪纓之家共有的集體經歷，稱不上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豐功偉業。因此，以這類事蹟為主題的畫作應當有不少是屬於社交應酬型的樣版化作品，有些是畫主自我慶祝留念之作，有些則是

---

[53] 自明代中葉起，文人題詠這類畫作的例子即頗多，如邱濬，〈瓊林醉歸圖為同年長垣李溥作〉，《重編瓊臺稿》，收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以下簡稱「四庫全書」），1248冊，卷2，頁24；徐溥，〈瓊林醉歸圖為李大濟題〉，《謙齋文錄》（四庫全書1248冊），卷1，頁556；程敏政，〈工部吳主事瓊林醉歸圖贊〉，《篁墩文集》（四庫全書1251冊），卷56，頁303；莊昶，〈李黃門瓊林燕歸圖〉，《定山集》（四庫全書1254冊），卷2，頁179-180；周瑛，〈瓊林春意圖序〉，《翠渠摘稿》（四庫全書1254冊），卷1，頁724；邊貢，〈題章郡守瓊林醉歸圖〉，《華泉集》（四庫全書1264冊），卷2，頁38；何景明，〈谷進士宴歸圖歌〉，《大復集》（四庫全書1267冊），卷13，頁111；王立道，〈胡進士瓊林醉歸圖〉，《具茨集》（四庫全書1277冊），卷3，頁685-686；吳寬，〈恩榮圖詩序〉，《家藏集》（四庫全書1255冊），卷41，頁365-366。

[54] 這類畫作自明代中葉以還亦常受文人題詠，例如李東陽，〈題傅曰川修撰曰會中書兄弟趨朝圖〉，《懷麓堂集》（四庫全書1250冊），卷10，頁107；倪岳，〈傅曰川曰會雁行待漏像圖限韻短歌〉，《青谿漫稿》（四庫全書1251冊），卷2，頁28；顧清，〈題東濱父子趨朝圖〉，《東江家藏集》（四庫全書1261冊），卷14；吳寬，〈賢科世繼圖序〉，《家藏集》（四庫全書1255冊），卷40，頁359；彭紹，〈天恩與誥圖序〉，《彭惠安集》（四庫全書1247冊），卷2，頁37-38；周瑛，〈觀南康太守郭公璿受誥勅圖〉，《翠渠摘稿》（四庫全書1254冊），卷4，頁801；王鏊，〈恭題巡撫南畿李司空四世誥命圖〉，《震澤集》（四庫全書1256冊），卷35，頁516-517；潘希曾，〈三覲圖稿序〉，《竹澗集》（四庫全書1266冊），卷6，頁715；林文俊，〈恩遇圖序〉，《方齋存稿》（四庫全書1271冊），卷6，頁789；楊繼盛，〈劉司獄承恩圖引〉，《楊忠愍集》（四庫全書1278冊），卷2，頁638-639。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他人饋贈的賀禮，與祝壽慶生之類的畫作無異。可能正因為如此，這類畫作在文字資料中雖時有所見，但實際上被後世珍重保藏者卻偏少。較有機會傳世的宦蹟圖，仍以記軍國大事者居多，[55] 除了軍事武功之外，治河通漕及賑災救荒因攸關國計民生，也成為較受矚目的大項。[56]

不過，與《鴻雪因緣圖記》更有直接淵源關係的宦蹟圖，並非這些單記一事的專題式紀宦圖，而是按年歲條陳個人畢生所經各項要事的「傳記圖」或「年譜圖」。從現存材料看來，這類型的宦蹟圖至遲在宋、元之交即已發展成形，如美國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所藏的元人《趙適瀘南平夷圖卷》（圖34）便是一例。[57] 此卷在進入清內府收藏之前，從未經文獻著錄，原蹟之上亦缺原始品名及製作者的款識題記，故畫中的主人翁究竟是誰？所記又為何事？目前難有定論。不過，據傅熹年的考察，圖中繪有元至元九年（1272）始建成的崇天門（大都宮城正南門），足見本卷所畫絕非如清宮舊題所言，乃北宋瀘南招討使趙適平定四川叛酋之事，而是某位漢族官員改効蒙元的歷程。全圖現存七段，起首兩段描繪的場地雷同，均為畫主的家宅庭園。由於宅前豎有「仁慈節孝表旌」牌坊，可知此人出自一個曾獲朝廷褒獎的節孝之家。前一幕寫他幼年在堂內讀書的情景，後一幕則畫他身著漢式

---

[55] 相關研究參考馬雅貞，〈戰勳與宦蹟：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明代研究》，17期（2011），頁49-87。

[56]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不少相關畫例，紀軍功者有1645年《多鐸得勝圖軸》、1677年黃璧《董衛國紀功圖卷》、1681年《蔡毓榮南征圖卷》、1697年《范承烈北征督運圖冊》及1720-1723年《撫遠大將軍西征圖卷》等，紀治河通漕者有1651年趙澄《高明治水圖卷》及1776-1777年江萱《潞河督運圖卷》等，諸作圖版見該館所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繪畫卷（歷史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至於紀賑災救荒之例，則有1801年郭尚率《章武拯溺圖卷》（天津市歷史博物館），圖版見《天津の歷史と文化—天子の津文物資料展》（四日市：四日市市立博物館，1997），頁36-37；1824年蔣寶齡《紀水災詩畫冊》（上海博物館），圖版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五》（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379-380；1834年朱昂之《吳門荒政圖冊》（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Berlin），參見古原宏伸，〈朱昂之筆吳門荒政冊〉，《奈良大學文化財學報》，第1集（1982），頁23-43。

[57] 全卷完整彩圖，見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元畫全集》，第5卷，第1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頁276-297。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官服在廳外行禮，準備接受元朝的徵召。畫卷第三段的地點移至大都崇天門前，此時畫主已捨棄漢裝，改穿蒙古官服。第四和第五段的場景轉為一片林地，畫主坐鎮其間督導民伕伐木積薪。末尾兩段寫他率軍出征及收繫俘虜的場面，襯景又一變而為綿延無盡的崇山峻嶺。[58] 這一連串移步換形的舞台場景，一方面記述了畫主由幼及長、從求學到任官的人生軌跡，另一方面也呈現了由家而國、從帝京宮闕到戰地江山的空間更迭，以此來烘托畫主一生峰迴路轉、豐富多姿的仕宦經歷。

在《趙適瀘南平夷圖》之後，存世的傳記式或年譜式宦蹟圖多為明代中後期的作品，包括《王瓊事蹟圖冊》46幅（中國國家博物館）、沈介所繪《梁夢龍恩榮百紀圖冊》30幅（北京首都博物館）以及萬曆十六年（1588）余士、吳鉞合繪的《徐顯卿宦蹟圖冊》26幅（北京故宮）等。這幾套明代畫冊的圖幅及分景數量均遠較《趙適瀘南平夷圖》繁多，但敘事結構大體仍不脫由少至長、由家而國、從京師到地方的時空推移而行。畫主王瓊（1459—1532）、梁夢龍（1527—1602）及徐顯卿（1537—1602）皆是科舉進士出身並仕至六部卿貳的正途高官，其中王、梁二人且於邊防兵政及河防漕運這兩項立國要務上有顯著建樹，堪稱一代重臣。[59] 王瓊為山西太原人，1484年進士，歷官總督漕運、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及吏、兵、戶三部尚書。他的宦蹟圖上有當時名流徐霖（1462—1538）行書引首「豐山恩榮次第」六字，全冊內容也確實如引首所示，除了紀錄其進諫、理財、治邊、督漕等實績之外，[60] 亦側重於鋪陳他一路從登科入仕到退休去世所享受的各項恩榮禮遇，計有〈金

---

[58] 傅熹年，〈訪美所見中國古代名畫札記（下）〉，《文物》，1993年7期，頁73-75。

[59] 張正明，〈明代重臣王瓊〉，《晉陽學刊》，1997年5期，頁103-108；張毅，〈略論梁夢龍的歷史貢獻〉，《社會科學論壇》，2008年9B期，頁120-124。

[60] 本冊圖像僅6幅已經發表，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繪畫卷（歷史畫）》，頁16-21，其餘40幅的內容目前只能根據標題文字判定。全冊逾半是畫王瓊任官功績，包括〈戶科給事〉、〈指斥權奸〉、〈回話認罪〉、〈職掌十庫〉、〈對鼓折獄〉、〈被命選軍〉、〈點選官軍〉、〈經略三關〉、〈督理寧夏〉、〈規畫延綏〉、〈總督三邊〉、〈提督固靖〉、〈經筵侍講〉、〈青宮正字〉、〈巡視鳳廬〉、〈總督宣大〉、〈巡視西路〉、〈總制四鎮〉、〈甘肅遇虜〉、〈凱捷歸朝〉、〈督理漕運〉、〈濬河修路〉、〈專職巡撫〉、〈奏論回天〉、〈疏毀迎佛〉等25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榜登名〉、〈欽賜羊酒〉、〈誥命封贈〉、〈銀臺晉秩〉、〈欽賞銀牌〉、〈蔭子賜幣〉、〈欽獎金幣〉、〈敕賜旌獎〉、〈誥函累賜〉、〈梓里榮歸〉、〈賜兆焚黃〉、〈奉敕修塋〉、〈遣官諭祭〉等十三條，以顯揚其生榮死哀的一生。

梁夢龍為河北正定縣人，1553年進士，歷官薊遼總督、兵部及吏部尚書。他的宦蹟圖冊除了有他自撰的圖說之外，還有當時知名文士湯煥（1570年舉人）隸書「恩榮百紀」四字引首。故與《王瓊事蹟圖》相仿，全冊亦兼顧朝廷恩典與任官實績這兩方面的條述，前一項有〈弱冠賓興〉、〈鹿鳴嘉宴〉、〈禮闈連第〉、〈玉殿傳臚〉、〈恩榮賜宴〉、〈青瑣貤封〉、〈考績蒙恩〉等七則，後一項則包括〈秘閣燃藜〉、〈直諫恩容〉、〈奉使晉陽〉、〈出入太行〉、〈澄肅三邊〉、〈周歷全陝〉、〈屢諫蒙恩〉、〈禮闈登俊〉、〈大廷受卷〉、〈旄鉞行邊〉、〈治河經歷〉、〈山右重遊〉、〈邊工告成〉、〈黃堰防禦〉、〈薇省馳驅〉、〈起左司馬〉、〈恭侍經筵〉、〈簡任銓衡〉等十八條，對他直言敢諫及守邊治河的事蹟均有著墨。[61]

相對於王瓊與梁夢龍，以吏部侍郎致仕的徐顯卿一生較乏豐功偉業可陳。他來自江蘇長洲，1568年成進士，在朝多擔任文學侍從或教育之官，其宦蹟圖所記事項亦無一涉及軍國大計，大半皆為朝中文教禮儀活動，而於皇城內苑建築景觀和各種朝會儀典的描繪尤為用力，如〈中秘讀書〉、〈承明應制〉、〈皇極侍班〉、〈司禮授書〉、〈棘院秉衡〉、〈金臺捧敕〉、〈楚藩持節〉、〈經筵進講〉、〈儲案綰章〉、〈國師正席〉、〈壽宮扈蹕〉、〈歲禱道行〉、〈日直講讀〉、〈輪直起居〉、〈玉堂親篆〉等計十五幅均屬此類，可視為翰林學士一類文官仕履的典型寫照。[62] 再者，

[61] 本冊目前僅引首2開及圖像4幅已經發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280-282；其餘26圖的內容則有賴馬雅貞慷慨提供每一圖相應的題記資料判定，特此致謝。然據圖記上的原始編號，此套圖像本來並不只30幅，例如現存〈恭侍經筵〉一圖的編號即為「第七十九」，可知全冊圖幅已大半不存，而佚失的部分多屬梁夢龍在萬曆一朝的經歷，其中又以督理薊遼邊防之功最為後世稱道。不過梁氏當時謀畫的遼東關外之役因涉及滿清建國的歷史，入清之後應當頗犯政治忌諱，本冊闕頁嚴重或許與此有關。

[62] 楊麗麗，〈一位明代翰林官員的工作履歷：《徐顯卿宦迹圖》圖像簡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年4期，頁42-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全冊專紀恩榮的圖幅也不多，只有〈鹿鳴徹歌〉、〈瓊林登第〉、〈幽隴沾恩〉等三頁，且所描寫的亦不外是鄉試、會試中式以及父母、祖父母獲得封贈等官場中常見的榮譽，不足為異。較特別的倒是冊中有不少是畫他生平逢凶化吉的奇遇以及靈應夢兆之類的神祕經驗，如〈孺慕聲聞〉繪其亡母顯靈之事；〈神占啟戶〉畫他應童生考前到江東廟求籤時遇到的靈異現象；〈危舟免難〉述其返鄉途中千鈞一髮躲過船難的幸事；〈荊岳臥病〉和〈聖祐己疾〉記他身染群醫束手無策的隱疾，但自從夢見孔子顯靈之後，竟獲得奇蹟似的痊癒；〈旋魂再起〉則描寫他病危時靈魂出竅而復返的異事。[63] 這類志怪述異色彩濃厚的圖文內容，在現存宦蹟圖例中較為罕見，像《趙遹濾南平夷圖》、《王瓊事蹟圖》及《梁夢龍恩榮百紀圖》均未選載類似事件。不過，後出的麟慶《鴻雪因緣圖記》就對這類神秘異常的際遇頗為看重，相關紀錄不勝枚舉。其中有紀仙緣者，如〈延年玩丹〉描述他六歲時見到一對丸狀發光體在空中飛行互撞並化為千百道流光，認為這應當是一種仙蹟。[64] 亦有紀夢兆者，如〈慈雲尋夢〉所畫為他十二歲的夢境，夢中他進入一座寺廟，見到自己的姻緣簿，其上即預示了他未來的天定良緣。[65] 另有紀天象示警者，如〈震澤瞻龍〉畫1810年他在太湖上空雲霧中望見兩道狀若龍尾的黑影，即船伕口稱的「太湖龍掛」，這原本只是水龍捲之類的自然現象，但他卻將之視為1813年林清之亂的預兆。[66] 同時，他還常記神明應禱顯靈之事，如〈龍潭感聖〉寫1843年他到北京黑龍潭龍王廟行禮，潭中平日無魚，此時忽有一條頭生雙角的黑色怪魚向他游來，直立水中、昂首波上，他便認定這是龍神現形。[67]

由此看來，《鴻雪因緣圖記》主要的敘事內容，包括紀官績、紀恩榮、紀奇遇等，大多已能從明人宦蹟圖中找到先例。此外，這些以紀宦為務的明代畫作偶爾也兼錄畫主的旅行活動。如《王瓊事蹟圖》中的〈雲程祖道〉

---

[63] 朱鴻，〈《徐顯卿宦迹圖》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年2期，頁47-80。
[64]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31-32。
[65]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38-40。
[66]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104-106。
[67]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668-6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5），描繪年輕的王瓊一身儒服騎騾攜僮進京赴考，在他前方溪山盡處赫然出現一座城池，可能就是他此行的目的地北京。畫中王瓊的五官面容富於個性，身軀構造的表現合理而具結實感，衣紋線描的用筆亦工，顯然出自擅繪肖像的畫家之手。至於山水景觀則採馬夏風格，惟形貌流於樣式化，缺乏與特定地理實境的連結，且做為地標的城池亦不具足以供人辨識身分的外觀特徵，故頗難確定是否真為北京。此種人物採肖像式而山水卻欠缺實景特性的狀況，也可在〈經略三關〉（圖36）和〈督理漕運〉（圖37）中見到。前一圖寫已位列公卿的王瓊身穿緋色蟒服騎馬率官兵巡察長城邊關，但邊地之景只草草以幾片簡略的丘巒帶過，並未畫出雄關或邊牆。後一圖則見他著緋色常服端坐在一航行於水上的官船中，岸邊還有一身穿青色常服的小官前來跪迎，所記應是正德元年他在右副都御史任內督辦漕運之事。不過圖中漕河之景僅以平直的渠岸來示意，並無閘壩、隄防等大運河特殊景物的點綴，可說亦缺乏地理辨識度。

《梁夢龍恩榮百紀圖》也繪有多幅梁氏旅行的場景，甚至連冊中所附的圖說亦有不少紀行文字，如〈治河經歷〉（圖38）便是其中一例，[68] 其文云：

> 龍由京兆調汴中治河副憲，旋奉檄開濬沛上新河，往來河南、山東、南直隸地方，彰德、衛輝、懷慶、洛陽、開封、歸德、汝寧、東昌、　州、濟寧、臨清、徐州諸郡，武陟、原武、陽武、孟津、鞏縣、河陰、汜水、滎澤、中牟、祥符、蘭陽、儀封、考城、虞城、蕭縣、碭山、曹縣、單縣、金鄉、沛縣、魚臺、滕縣、鄒縣、嶧縣、曲阜諸邑。徧覽黃河木欒店、銅瓦廂、野雞岡、孫家渡、趙皮寨、堅城、新集、符離集、趙家圈、保安山、雲龍山、子房山、徐州洪、呂梁洪、飛雲橋、大浮橋、小浮橋、黃鶴樓。登東嶽泰山、分水龍王廟，謁孟廟、孟林、孔廟，觀杏壇、夫子手植檜、孔林楷樹、子貢築室。工成西行，登中嶽嵩山，宿少林寺，過鼎湖、甘棠，覽三門七津砥柱之險。黃河在中國者三曲，龍先察盤陝西時，渡孟津一曲、寧夏一曲，今徐州一曲云。

[68] 本冊附有紀行文字的圖幅，尚有〈出入太行〉、〈周歷全陝〉和〈山右重遊〉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段記文詳載了1571年梁夢龍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並奉命治河時曾訪視的地方，除豫、魯、蘇三省黃河沿線的河防重鎮以及府、州、縣等行政轄區之外，還包括嵩山、泰山、曲阜孔廟、鄒城孟廟等名勝景點。但在畫幅之中，這些文字述及的地點卻無一被具體描繪出來。全圖與《王瓊事蹟圖》的〈督理漕運〉類似，僅以一段不具特殊地標或地貌的河道、一艘靠岸的官船以及岸上接駕的地方官吏來呈現梁氏巡河的概況，並無意刻畫黃河沿線的地理實景。

相較之下，《徐顯卿宦蹟圖冊》摹寫實景的興趣則顯著提升，全冊之中具體可辨的知名地點頗多，包括紫禁城午門、皇極殿、文華殿、文淵閣、翰林院、史館、起居館、玉帶河、天壇欞星門、國子監、北京貢院、天壽山陵園、曲阜孔廟、南京大報恩寺等。[69] 但總體看來，本冊在描繪一地之景時仍僅能達到局部性的寫實，而當中最信實可徵者莫過於建築景觀的部分，尤其是上述諸多北京宮廷與廟堂機構的建築物，即使不是畫家親眼對景寫真而來，也應當是參考可靠的圖樣繪成。至於在描寫建築物周遭的地理環境時，則依舊是傾向套用較概念式或風格化的山水形像，往往不講究一地實際的形勢方位、距離遠近及地質樣貌。如〈衝雪還朝〉（圖39）一頁寫1582年冬月徐氏由江南進京返朝，畫面可見一座仿北宋范寬式的雄偉雪峰矗立中央，乘轎盤山而行的徐氏出現在峰前右下角，峰後左側山間則有一城池當道，宛若關隘要塞。觀此城外牆高大整飭，城內又見規制崇閎的樓閣殿宇林立，應當就是北京。在此，畫家顯然刻意借用了「關山積雪」一類的仿古山水圖式，以營造明朝帝都雄踞北疆燕地的森然氣勢。但從實際地理狀況來看，徐氏從南方入京，無論循運河水驛還是陸路官道，所經之地俱為平曠之區，絕不可能遇到翻山越嶺的情境，此景毋寧是嚴重失實。

其次，本冊選繪的特定景點雖不少，但除了大報恩寺和孔廟兩景外，其餘均麇集於京畿之內。其地理分布範圍之所以如此狹窄，一方面固然與畫主生平宦遊多侷限於北京一地有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畫家無法處處隨行寫景所致。故徐氏縱使偶有機會離京到外地出差，卻始終未能將沿途經歷的景觀

[69] 本圖冊各頁所呈現的景點，參考朱鴻，〈《徐顯卿宦迹圖》研究〉，頁53-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形諸圖畫。如〈楚藩持節〉（圖40）記他1579年奉命前往湖北冊封荊王與通山王，圖說亦以紀行為主，全篇所述大體為往返江蘇丹徒與湖北武昌兩地的旅程，云：

> 萬曆己卯春三月，病甚，圖請假。時冊封屆期，領荊王金冊往蘄州、通山王金冊往武昌。自四月廿五日發舟，至六月初二日渡江，寓丹徒。初九日復渡江而北，從陸行，至廿二日抵蘄州。事竣，七月初三日抵武昌。初九日從江順流而下，屢阻風，次池州，復登陸，馳歸丹徒，七月廿二日也。稍憩，至八月初三日發舟，初六日二更抵宜興，住吳安節祖居。

不過畫面實際呈現的卻既非這段往返楚地的路途，也不是徐氏本次出使的目的地荊王府或通山王府，而是他從午門啟程的一幕，地點仍不出他最熟悉的北京城。

綜上所見，明代官員的傳記圖雖已將旅行活動納入敘事範圍，但和清嘉、道時期作品不同的是，它們並不注重旅程中實際山川地理風貌的模寫。此外，它們所選繪的旅遊活動類型亦較單純，不是趕考應試，便是離職赴任、出巡出使之類的官務旅行，可說均屬「行役」性質，對於遊山玩水、尋幽訪勝等與公事無關的觀光遊覽，則無具體著墨。當然，這並不意味名勝實景在明代紀宦圖像的發展過程中無足輕重。事實上，自十六世紀旅遊名勝圖大興以來，明人紀宦，除了繼續沿用傳統以人物故事畫形式呈現的宦蹟圖外，亦有改採這類以山水畫為主體的紀遊或紀勝圖者。[70] 例如繪有蘇州石湖、楓橋、虎丘、天平山、太湖洞庭山、垂虹亭、崑山、虞山、無錫玉女潭、張公洞、惠山、鎮江金山、焦山、松江泖湖等江南十六景的《江左名勝圖冊》，[71] 便是1583年蘇松兵備副使李頤（1602年卒）三年任滿時，地方士民為了紀念其治績而合力製作的一套轄區名勝圖。圖中各景分別選自其治下的蘇州、常州、松江、鎮江四府，頗有藉山川風物之美來歌功頌德之意。又

[70] 相關研究參見Elizabeth Kindall, “Visual Experience in Late Ming Suzhou ‘Honorific’ and ‘Famous Sites’ Paintings,” *Ars Orientalis*, vol. 36 (2009), pp. 137-177.

[71] 現藏南京博物院，圖版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七》（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62。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繪有閶門、虎丘、天平山、靈巖山、陽山、太湖洞庭山、垂虹橋、虞山七星檜等蘇州府境內名勝十景的《送寇公去任圖冊》，⑫ 亦是一件圖繪式的去思碑，乃1626年蘇州知府寇慎（1577—1669）離任時，當地士民感念其惠政而集體創製的餞行贈禮。且據圖冊籌組人毛文煒的跋語：「其間所繪為湖為海、為江為澤、為巒為丘，彙州邑之奇於尺幅間，恩波之浩也，保障之峙也，以至一夫一喬均霑惠露，而一亭一閣遍貯仁風也」，可知一地的名勝集錦之所以能夠成為表宦之具，主要是這些美好的風光可以用來象徵該地父母官德澤之深廣，遍及轄區內所有百姓萬物，就連樹石草木、亭臺樓閣等景物也一併受到滋潤。

不過，這兩件官員去任圖基本是運用時下流行的「地方八景」圖式繪成，無論選景或構圖，多與晚明已趨於格套化的姑蘇十景或十二景圖如1637年邵彌等合繪的《蘇臺勝覽圖冊》、⑬ 1638年張宏《蘇臺十二景圖冊》⑭ 及1643年袁尚統《蘇臺十二景圖冊》⑮ 等相類，且山水中的點景人物亦僅從事單純的遊覽觀景活動，未見任何凸顯畫主政績的敘事情節。因此，若無標題或題跋文字的提示，實不易從圖像上看出它們是紀念個人宦蹟之作。換言之，明代中晚期的紀宦圖雖兼採人物敘事和名勝山水兩體，但這兩種模式通常各行其是、互不相混。亦即採人物敘事圖式者，不寫名勝實景；而採名勝山水圖式者，則不畫人物事蹟。大約要到清初，始有將這兩種圖式混搭在一起的作品出現，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例子便是著名詩人暨戲曲家尤侗（1618—1704）於1694年纂成的《年譜圖詩》一書。

尤侗為江蘇長洲人，1646年拔貢，1652年任直隸永平府（河北盧龍）推

⑫ 現藏蘇州博物館，圖版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六》（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55-57；作品介紹見龔建毅，〈送寇公去任圖〉，《文物》，1993年12期，頁72-81。

⑬ 現藏上海博物館，圖版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38-39。

⑭ 現藏北京故宮，圖版見《明代吳門繪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頁193-195。

⑮ 現藏上海博物館，圖版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321-3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官，至1655年即掛冠求去。鄉隱廿二年後，復於1679年舉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入朝纂修《明史》，至1682年長子尤珍中進士後，便又再度辭官歸里。晚年他不僅自著《年譜》二卷，還另外編寫了一部《年譜圖詩》，摘選生平重要事蹟十六項，倩人繪製成圖，每一幅均有他自己的詩詠相隨，而各圖的主題意義在書中也有極清楚的界定如下：

	圖名	主題	事蹟
1	寒宵伴讀	思亡妻	妻曹令（1621—1678）冬夜陪讀
2	春山攜友	思故人	與知交湯傳楹（1620—1644）同遊虎丘
3	斜塘避難	傷亂	1645年清軍南下，舉家遷至蘇州斜塘鎮避亂
4	北平聽訟	紀宦	1652年授永平推官，將違法旗丁按律治罪
5	盧龍賑饑	憫荒	1654年賑濟永平府饑民
6	榆關觀獵	出塞	在永平府任職時參觀山海關駐軍校獵
7	小園偕隱	歸田	1657至1678年歸家隱居
8	草堂戲彩	思親	搬演自編新劇《鈞天樂》娛樂父親
9	書齋教子	思子	為二子尤珍、尤瑞授課
10	金門待漏	紀遇	1679年尤侗舉博學鴻儒，1682年尤珍中進士，父子二人得以同朝
11	瀛臺賜宴	誌盛	1681年出席皇帝在瀛臺舉辦的宴會
12	玉堂修史	述職	1679至1683年入翰林院修《明史》
13	西湖泛月	紀遊	1685、1686、1687、1688年四度遊杭州西湖
14	西山築壙	壽藏	在蘇州西郊光福鎮官山鷂子塢卜地並自營生壙
15	蒲團禮佛	參禪	在自家書齋中供奉佛像
16	玉局游仙	學道	

就圖幅總數論，尤侗這套年譜圖顯然不及王瓊、梁夢龍、徐顯卿等人的宦蹟圖，但援用的圖式類型倒是更為多元分歧，至少涉及了宦蹟圖、家譜圖和名勝圖等三種源流不同的圖像系統。其中，來自人物故事型宦蹟圖系統者仍居最大宗，包括記述任官經歷的「紀宦」、「憫荒」、「出塞」、「紀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遇」、「誌盛」、「述職」等六幅，以及描寫家庭生活和親人倫常關係的「思亡妻」、「歸田」、「思親」、「思子」等四幅。屬於家譜圖系統者，有〈西山築壙〉（圖41）一幅，描繪尤侗在蘇州官山自築的墓園樣式和周圍山景。這種以自家墳塋為建築地標而繪成的景觀圖在明代即頗盛行，並已成為家譜中最常見的附圖類型之一，但入清以前似乎還未被應用在傳記圖或宦蹟圖上。取自名勝山水圖系統者，則有〈春山攜友〉（圖42）及〈西湖泛月〉（圖43），分別描繪熱門觀光勝地虎丘和西湖。〈春山攜友〉可見到雲巖寺塔、劍池、雙吊桶、千人石等地標性景物，構圖取角類似張宏及袁尚統《蘇臺十二景圖冊》中的虎丘一景（圖44，45），惟點景人物尺寸大增，可一眼認出千人石上作明代儒生打扮的兩名遊客即為尤侗及其好友湯傳楹。同樣地，〈西湖泛月〉中的人像也偏大，故尤侗薙髮著清服獨自搭舟遊湖賞月的形貌亦清晰易辨。至於四周湖景，則與《海內奇觀》中的〈六橋煙柳〉（圖46）取角相近而景物較繁，除六橋和湖心亭之外，還繪有雷峰塔及杭州城西門一隅。

必須一提的是，這兩幅收入尤侗《年譜圖詩》中的名勝圖，完全不具表宦的意圖，所記純為個人私下的遊山玩水之樂，在體裁上已突破了過去生平事蹟圖只畫行役或公務差旅的慣例。而隨著這類名勝遊覽圖像的滲入，此書的紀宦成份亦相對削減，全篇顯然不再如以往官員的傳記圖那般專注於仕宦履歷的鋪陳，公餘之暇的娛興活動及生活情趣等看似瑣屑之事，至此也堂而皇之成為值得紀念的生平要事。不過，名勝遊覽雖已被《年譜圖詩》列為正式項目，但相關圖像僅見兩幅，在書中所占比例尚低，仍屬點綴性的配角。而緊接下來的十八世紀，成套的個人生平事蹟圖就如同當時天下名勝圖的情形一般，不管是因乏人製作，還是因原蹟失傳，遍搜這段時期朝野內外之作，均未見任何實例留存，故目前無從掌握其樣貌。至於隨後的嘉、道年間，則不單傳世作品激增，當中蘊含的名勝圖像比重亦扶搖直上。如《鴻雪因緣圖記》所錄240圖中，即有142幅為名勝圖（見表3），《花甲閑談》32圖中，記天下名景者亦有19幅（見表2），比例均高達六成。而《泛槎圖》和《悟蘐亭畫稿》二作（見表1及表4），更幾乎全以名勝旅遊圖來側寫畫主生平經歷。可說傳記圖發展至斯，紀遊紀勝的篇幅不但大舉擴張，甚至有反客為主之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乾嘉考據學風與自傳圖的地志遊記化

或許正因為書中紀各地山川風物的篇章過於強勢，《泛槎圖》、《花甲閑談》及《鴻雪因緣圖記》等這幾部在傳統目錄學上屬於「傳記類」的著作，[76] 有時也被歸入「地理類」，以名勝古蹟志或輿地遊記之姿聞於世，[77] 遂不免模糊了它們原先作為個人生平事蹟錄的體裁屬性和功能。此種敘事重心由「人」轉為「地」的變體自傳，看似失焦、離題，不過在深受乾嘉學風洗禮的清代中後期，卻可能比通篇聚焦於表彰一己功業的宦蹟錄更受青睞。而最能顯露此一偏好者，就是影響後世深遠的乾隆朝官修目錄學鉅著《四庫全書總目》。依這部目錄的分類，個人自述生平經歷的作品大多被視為傳記資料而歸入「史部傳記類」的「雜錄之屬」中，所錄之書包括收進《四庫全書》的九種，以及僅列為存目的四十六種。其中，屬於自撰之宦蹟錄者，有明代毛紀《歸田雜識》、趙璜《歸閑述夢》、王之垣《歷仕錄》、李同芳《視履類編》以及清代胡文學《李贅》等，數量不多，且全都只列在存目之下。顯然，四庫館臣對這些著作的參考價值多持保留態度，尤其是對當中開門見山自我標榜者，更是屢次出言譏諷。如《視履類編》是萬曆朝山東巡撫李同芳（1580年進士）自錄其生平善蹟之作，全書共分四十門，每一門都以佳名標目，結果便遭到以下譏評：「自古以來自作傳者有之，大抵敘述閱歷始末耳，至於著一書以自譽，則自有文籍未之前聞也」。[78] 又如《李贅》一書，乃清初監察御史胡文學（1652年進士）所著，自述擔任眞定推官時所成

[76] 例如《販書偶記》這部被視為《四庫全書總目》補篇的清代著作總目，即將《泛槎圖》、《花甲閒談》及《鴻雪因緣圖記》三書列在「史部傳記類雜類之屬」，見孫殿起，《販書偶記》（上海：上海書店，1992），卷6，頁14b。

[77] 如《鴻雪因緣圖記》雖為個人年譜，但也被收入王錫祺（1855-1913）所輯清代最具規模的輿地叢書《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五函之中；又據北京國家圖書館目前的分類，《花甲閑談》被歸入「地誌門名勝古蹟類」，而《泛槎圖》則被歸入「地誌門遊記類」，見《國家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第4卷，頁569，609。

[78] 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64，頁404。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就的十八項政績，且每記一項，多先舉古代先例一二條來和自己的事蹟相媲美，因此也被調侃「縱言不盡誣，亦頗嫌於自譽也」。[79] 可見，由傳主自編自寫的宦蹟錄，即使內容足以傳信，但只要表功述德的手法不夠委婉含蓄，總不免給人自吹自擂的印象，這恐怕也是四庫館臣未特別看重此類著作的理由之一。

反之，能獲得館臣推薦的「雜錄」型自傳，不僅內容不以直接描寫傳主個人行實為務，形式也與一般慣見的人物傳記之體如正史本傳、年譜、行狀、家傳、墓誌等相去甚遠，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不像傳記的傳記，其實多半是「紀行錄」一類側重紀地紀程的作品。如正式收入《四庫全書》「傳記類雜錄之屬」的九部著作之中，就有七部屬於此類，包括宋范成大《驂鸞錄》及《吳船錄》、陸游《入蜀記》、元劉鬱《西使記》、清杜臻《閩粵巡視紀略》、高士奇《扈從西巡日錄》及《松亭行紀》。從存世材料看來，這類著作大多是以日記形式紀錄作者本人仕宦生涯中赴考、就任、離職、遷調、出使或扈從天子巡幸的旅行經歷，且自宋至清，代代均有不少士子官員投入書寫的行列，儼然已成人物傳狀之外，另一種常見的紀宦之具。惟這類文字既以記旅遊行程為主，往往對沿途的自然及人文地理風貌著墨較多，對筆者本身的公務活動反倒輕描淡寫，故乍看之下頗易與山經地志之類的輿地著作相混淆。雖說四庫館臣在形式上並未因此而將這類作品歸入「地理類」，但實質上卻還是傾向以書中所載地理資訊是否可供考史證經來判定其價值。例如評范成大《吳船錄》時，便特別推崇此書「於古跡形勝言之最悉，亦自有所考證」。[80] 論及陸游《入蜀記》時，亦大加讚許其「於山川風土，敘述頗為雅潔，而於考訂古跡，尤所留意…足備輿圖之考證…非他家行記徒流連風景，記載瑣屑者比也」。[81] 顯然，兩書不單是以文采辭章取勝，更憑藉詳實可靠的地理考察而備受肯定。

誠如多數論者所言，《四庫全書總目》大抵是一部建構在十八世紀漢學

[79] 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64，頁406。
[80] 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58，頁302。
[81] 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58，頁303。

臺灣人文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派家法上的著作，[82] 故而對漢學家講究的地理考據亦格外留心。上述紀行錄一類的作品能以絕對多數在「傳記類雜錄」一門中稱霸，實際也正是拜此一學術取向所賜。而這個已獲得清廷背書的學術好尚，對接下來嘉、道年間自傳型著作的發展，無疑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或啟示性。幾部這段時期受到好評的作品，包括《泛槎圖》、《鴻雪因緣圖記》及《花甲閑談》，所圖所寫明顯都如同紀行錄一般側重於誌地紀勝。其中，《鴻雪因緣圖記》透過紀遊來紀宦之處最多，遂也被認為直接繼承了紀行錄的傳統。例如道光朝名臣潘世恩（1769—1854）在追溯此書體例的來源時即指出：

> 自來英儒贍聞之士，類能以宦游轍迹所至，見之著錄，垂示方來，如宋范石湖（成大）《驂鸞錄》、《吳船錄》、陸務觀（游）《入蜀記》、國朝王阮亭（士禎）《皇華紀聞》、高澹人（士奇）《松亭行紀》。…見亭（麟慶）博覽能文，早歲登上第，由館閣外簡，宦跡半天下。是編所述，凡道里山川、形勝古蹟、風土民俗、河防水利，靡不博考見聞，兼綜條貫。生平文章政績，略具於是，而大旨以紀游為主，其體於范、陸諸作為近。[83]

可知就潘氏看來，麟慶的紀宦之作不但在體裁上與范成大《吳船錄》、陸游《入蜀記》等曾備受四庫館臣稱道的紀行錄相近，且內容也同樣是以博考沿途地理實況見長。

如前所述，以紀行體側記一己生平事蹟，除了能夠提供當時學界注重的紀實性地理資訊外，另一個好處則是可以迴避招搖自炫功業之嫌。像道光朝著名學者龔自珍（1792—1841）為《鴻雪因緣圖記》作序時，便一面稱許麟慶「行部所及，山川形勢、人民謠俗、古蹟今狀皆備載之，弗為無本之說與不急之言」；另一面又盛讚他「韜晦其所學，不欲張大其名目」，例如他於江南河道總督署謙豫齋中編成的《河工器具圖說》，雖可說是「古今之奇

[82] 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故宮學術季刊》，23卷2期（2005），頁83-128；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頁732-755。

[83]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作，天下有用之書」，但在將這項成就載入《鴻雪因緣圖記》中時，卻只用「謙豫編圖」這等舉重若輕的標題來紀念。[84] 而針對麟慶這種「韜晦」型的紀宦手法，其子崇實、崇厚後來也曾做過簡扼的說明：「先君性好山水，宦轍所至，不廢登臨，隨於其時采訪風俗，修舉廢墜。雖大旨以紀遊為主，實非泛泛遊記比也，亦非汲汲欲問世也」。[85] 可見麟慶採用紀遊誌勝之體來紀宦蹟，確實是有意塑造自己喜好遊山玩水卻非只圖耳目之娛、勤於省方問俗卻不四處鑽營奔競的形象。

與麟慶相比，張寶雖無任何功名宦業可述，但他藉壯遊廣結天下名流的舉動，有時仍不免令人懷疑是否意在沽名釣譽或夤緣求售，而最後也是借助以模山範水為務的《泛槎圖》來替他洗刷嫌疑。例如1824年為此書撰序的南京文士朱應坊就坦言，起初見張寶積極結納海內之士，以為此人雖自稱無意仕進，但終究「名心未去」，直到讀過《泛槎圖》，始信張寶「志在山水之間，而不在朱門要路也；在務求山水之奇趣，而不在矜言快遊以聳動一世觀聽也」。且張寶這部紀遊圖既是根據實地觀察各地山川寫成，在朱應坊眼中，也正符合清初考據學家閻若璩（1636—1703）所提「地理之學莫妙於目驗」的準則，較諸一般「紙上虛摹、空中想像」而成的郡縣志或輿地圖，無疑更能「為橫覽名區、博求實學之一助」。[86]

結語

明清兩代的成套自傳圖，大體是屬於敘事人物畫一類，唯有嘉、道年間的作品與眾不同，特別偏好以名勝山水圖形式來記述自己的生平宦旅或遊歷見聞，如張寶《泛槎圖》、麟慶《鴻雪因緣圖記》、張維屏《花甲閑談》及劉愔《悟蘐亭畫稿》等皆為佳例。此種以個人履歷編年為經、天下各地勝景為緯的編繪體例，其實是結合了「生平事蹟圖」和「天下名勝圖」這兩類原

[84]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259。
[85]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768。
[86] 張寶，《泛槎圖》，四集，頁7a-8a。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源流及功能均不同的圖像系統而成，可視作是一種別出新裁的創格。由現存實例觀之，生平事蹟圖與天下名勝圖均是十六世紀才廣泛流行的圖像類型。初興之際，兩者的區隔尚稱分明。生平事蹟圖側重紀人紀事，其中又以紀仕履宦蹟者最為常見，主要採肖像人物或歷史故實圖的模式繪成，即使畫中偶有山水場景，亦多非特定景點地理實貌的描寫。天下名勝圖則側重紀地寫景，主要採山水圖或地圖的形式繪成，通常不具敘事成分，即使畫中出現點景人物，亦非指涉某位特定人士。除圖式相異外，兩者的機能亦有別，生平事蹟圖旨在表彰個人功業或家聲祖德，天下名勝圖則意在蒐羅宇內奇觀，可助人尋幽探奧，具旅遊指南之效。

值得注意的是，天下名勝圖在明代原本皆出自私修，但到了清代皇權及國勢臻至鼎盛的十八世紀，則僅見《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和《南巡盛典—名勝圖》等官修欽定之作，測繪帝國江山勝概的大業至此儼然已遭到清廷全面控管，似不再容許私家之手任意染指其間。同時，成套的士子或官員生平事蹟圖亦於此刻偃旗息鼓，公私兩造俱無作品行世。因此，十九世紀張寶、麟慶等個體私自利用各地形勝圖來記述畢生壯遊或宦旅經歷的行動，可說既重振了一度歸於沉寂的生平事蹟圖製作，也開啟了天下名勝圖走向私家化的新頁。而兩種圖像系統經過他們的混融運用之後，亦各自呈現出與明代先例相異的體裁及功能。大致看來，生平事蹟圖因攙入大量地景山水而趨於「遊記化」，除了傳揚個人功業外，還能提供當時學界普遍重視的紀實性地理資訊。天下名勝圖則因同步側錄作者本身的行蹤和事蹟而趨於「自傳化」，在發揮觀光導覽功效之餘，儼然也成了一種表述個人履歷乃至其家族歷史的視覺工具。

（責任編輯：陳卉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1：張寶《泛槎圖》圖目（備註欄標有「△」者為名勝圖）

		圖名	地點	備註
初集	1	乘槎破浪		
	2	秦淮留別	南京秦淮河	△
	3	石城早發	南京石頭城	△
	4	燕子風帆	南京燕子磯	△
	5	瓜洲夜泊	瓜洲	△
	6	浮玉觀淳	鎮江金山	△
	7	邗水尋春	揚州	△
	8	甓湖問津	高郵甓社湖	△
	9	清江候閘	清江浦閘	△
	10	黃河晚渡	清黃交匯	△
	11	臨清阻雨	臨清	△
	12	蘆溝曉騎	蘆溝橋	△
	13	帝城春色	北京	△
續集	1	昆明聚秀	北京昆明池	△
	2	盤山疊嶂	薊縣盤山	△
	3	恒巒積雪	北嶽恆山	△
	4	韓嶺悲風	山西靈石韓信墓	△
	5	太華晴嵐	西嶽華山	△
	6	龍門激浪	黃河龍門	△
	7	嵩屏曉翠	中嶽嵩山	△
	8	岱峰觀日	東嶽泰山	△
	9	大觀賞雪	安徽安慶大觀樓	△
	10	琵琶秋思	江西九江琵琶亭	△
	11	黃鶴晚眺	湖北武昌黃鶴樓	△
	12	洞庭煙櫂	洞庭湖岳陽樓	△
	13	衡嶽開雲	南嶽衡山	△
	14	澳門遠島	廣東澳門	△
	15	羅浮訪梅	廣東羅浮山	△
	16	扶胥望海	廣州扶胥港	△
	17	湘橋仙蹟	廣東潮州湘子橋	△
	18	滕閣看霞	江西南昌滕王閣	△
	19	匡廬飛瀑	江西廬山	△
	20	小姑砥柱	安徽小姑山	△
	21	黃山雲海	安徽黃山	△
	22	虎阜納涼	蘇州虎丘	△
	23	西湖春泛	杭州西湖	△
三集	1	端州採硯	廣東肇慶	△
	2	獨秀探奇	廣西桂林獨秀峰	△
	3	海珠話別	廣州海珠寺	△
	4	庾嶺憶梅	廣東大庾嶺	△

		圖名	地點	備註
三集	17	海寧觀潮	海寧錢塘潮	△
	18	禹陵謁聖	紹興禹陵	△
	19	蘭亭問津	紹興蘭亭	△
	20	赤城餐霞	浙江天台山	△
	21	桃源覓洞	浙江天台山	△
	22	雁蕩尋秋	浙江雁蕩山	△
	23	龍湫觀瀑	雁蕩山龍湫	△
	24	東甌弔古	浙江永嘉江心嶼	△
	25	武夷品茶	福建武夷山	△
	26	岫雲折桂	北京岫雲寺	△
	27	瀛海留春	北京太液池	△
四集	1	龍江艤槎	南京龍江關	△
	2	鍾阜穿雲	南京鍾山	△
	3	翠微環眺	南京清涼山	△
	4	隱仙聽琴	南京隱仙庵	△
	5	雨華遇雨	南京雨花臺	△
	6	北極登高	南京雞籠山	△
	7	臺城觀漁	南京臺城	△
	8	棲霞臨碑	南京棲霞山	△
	9	東園小飲	南京東園	△
	10	天印聞歌	南京天印山	△
	11	祖堂品泉	南京祖堂山	△
	12	莫愁評畫	南京莫愁湖	△
	13	華山參禪	南京花山	△
	14	西樓顧曲	南京秦淮西樓	△
	15	獻華鬥奕	南京獻花巖	△
	16	三茅採藥	南京三茅峰	△
	17	天闕歸樵	南京牛首山	△
	18	大山廬墓	南京	△
五集	1	會仙留跡	廣西宜州會仙山	△
	2	昭州訪友	廣西平樂縣	△
	3	壩城泛月	廣西陽朔縣	△
	4	畫山觀馬	桂林九馬畫山	△
	5	桂林泊棹	桂林獨秀峰	△
	6	月牙遠眺	桂林月牙山	△
	7	風洞尋秋	桂林風洞山	△
	8	仙巖賦詩	桂林劉仙巖	△
	9	棲霞穿洞	桂林棲霞寺	△
	10	六洞讀碑	桂林老君洞	△
	11	南薰懷古	桂林南薰亭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

	5	八境重登	江西贛州八境臺	△			12	龍城話舊	廣西柳州	△
	6	仙瀛分韻	南京百花洲	△		六集	1	崑崙演派	青海崑崙山	△
	7	鳩江午泊	安徽蕪湖鳩江	△			2	峨嵋晴雪	四川峨嵋山	△
	8	采石阻風	安徽采石	△			3	點蒼暮煙	雲南點蒼山	△
	9	家園宴樂	南京三山街				4	疊翠朝霞	貴州疊翠山	△
	10	東城賞荷	江蘇儀徵	△			5	五臺歸雲	山西五臺山	△
	11	萸灣訪僧	揚州高明寺	△			6	武當夢遊	湖北武當山	△
	12	九華琴佛	安徽九華山	△			7	五指擎天	海南島五指山	△
	13	虹橋修禊	揚州虹橋	△			8	虞陽海旭	江蘇常孰虞山	△
	14	靈巖望湖	蘇州靈巖山	△			9	紫琅香市	江蘇南通狼山	△
	15	鄧尉香雪	蘇州鄧尉山	△			10	雙山毓秀 萬水朝宗	長江出海口	△
	16	理安避雨	杭州理安寺	△						

表2：張維屏《花甲閑談》圖目（備註欄標有「△」者為名勝圖）

	圖名	紀年	地點	備註			圖名	紀年	地點	備註
1	桐屋受經	1791	河南			15	黃河曉渡		清黃交匯	△
2	松廬把卷					16	赤壁夜遊		黃州赤壁	△
3	羅浮攬勝	1815	廣東羅浮山	△		17	江漢飛鳧		湖北黃鶴樓	△
4	庾嶺衝寒		廣東大庾嶺	△		18	襄樊駐馬	1826	湖北襄陽隄	△
5	杭寺梵鐘	1811	杭州西湖	△		19	黃梅集雁	1823	湖北黃梅縣	
6	蘇臺鐙舫		蘇州虎丘	△		20	建昌捕蝗	1836	江西建昌縣	
7	洞庭雪櫂		湖廣洞庭湖	△		21	天津望海		天津	△
8	揚子風颿		鎮江金山	△		22	天池看雲		江西廬山天池	△
9	鄉園舊雨					23	青原訪碑	1835	江西青原山	△
10	京國古風		北京			24	匡廬觀瀑		江西廬山	△
11	香閣懷仙					25	鶴樓轉餉	1834	湖北黃鶴樓	△
12	燈龕伴佛					26	鹿洞講書	1836	江西白鹿洞書院	
13	三度趨朝	1817	紫禁城勤政殿			27	快閣攜琴	1832	江西泰和快閣	△
		1822	紫禁城乾清宮			28	章江泛宅	1836	江西章江	△
		1830	紫禁城勤政殿			29	荊渚煙波		湖北荊州	△
						30	桂林巖洞	1837	廣西桂林	△
14	五番鎖院	1822	湖北			31	珠海唱霞		廣州海珠寺	△
		1825	湖南							
		1832	江西			32	花村種菜		廣州花棣東園	
		1834	江西							
		1835	江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3：麟慶《鴻雪因緣圖記》圖目（備註欄標有「△」者為名勝圖）

	圖名	紀年	地點	備註			圖名	紀年	地點	備註
1	39歲像					121	清晏受福	1834	清江浦清晏園	
2	延年玩丹	1798	河南南陽府署			122	天然定誌	1834	徐州天然閘	
3	環翠呈詩	1801	北京			123	平成濟美	1834	海安廳成平臺	△
4	靜存受經	1802	惲秉怡書塾			124	福興起碑	1834	運口福興閘	
5	慈雲尋夢	1804				125	清華品秋	1834	清江浦清晏園	
6	西湖問水	1806	杭州西湖	△		126	貞應培堤	1835	高郵貞應祠	△
7	淨慈坐禪	1806	西湖淨慈寺	△		127	惠濟呈魚	1835	運口惠濟祠	△
8	韜光踏翠	1806	杭州韜光庵	△		128	西園賞雪	1835	清江浦清晏園	
9	錢塘觀潮	1806	錢塘江口	△		129	雲龍聯詠	1836	徐州雲龍山	△
10	玉泉引魚	1806	杭州西湖	△		130	高明讀畫	1836	揚州高明寺	△
11	六和避險	1806	杭州六和塔	△		131	妙高望月	1836	金山江天寺	△
12	赤城餐霞	1807	浙江天台山	△		132	甘露凌雲	1836	北固山甘露寺	△
13	石梁懸瀑	1807	浙江天台山	△		133	焦山放鼇	1836	焦山定慧寺	△
14	禹穴徵奇	1807	紹興禹陵	△		134	三詔題名	1836	焦山三詔洞	△
15	西溪尋梅	1807	杭州西溪	△		135	別峰尋徑	1836	焦山別峰庵	△
16	敷文載筆	1807	杭州敷文書院	△		136	海門坐雨	1836	焦山海門庵	△
17	永嘉登塔	1808	溫州永嘉山	△		137	詠樓話舊	1836	揚州高詠樓	△
18	石門躍鯉	1808	青田縣石門洞	△		138	桃菴雅敘	1836	揚州桃花庵	△
19	京兆報捷	1808	北京			139	謙豫編圖	1833	南河總督署	
20	昆明望春	1809	北京昆明湖	△		140	氾光證夢	1836	寶應縣氾光湖	
21	午門釋褐	1809	北京午門			141	賞春開宴	1837	清江浦清晏園	
22	瓜洲泊月	1809	瓜洲	△		142	湖心建塢	1838	洪澤湖	
23	寄暢攀香	1809	無錫寄暢園	△		143	龜山問井	1838	洪澤湖龜山	△
24	虎邱述德	1809	蘇州虎丘	△		144	洪澤歸帆	1838	洪澤湖	
25	蘭亭尋勝	1809	紹興蘭亭	△		145	荷亭納涼	1838	清江浦清晏園	
26	天一觀書	1809	寧波天一閣	△		146	東園探梅	1839	揚州東園	△
27	海舶望洋	1809	寧波鳳凰口			147	河口問壽	1839	清江浦	
28	六橋問柳	1810	西湖六橋	△		148	皂河喜雨	1839	宿遷皂河	
29	震澤瞻龍	1810	江蘇太湖	△		149	龍門湖市	1839	洪澤湖龍門壩	
30	鳳閣吟花	1812	內閣典籍廳			150	福壽拜恩	1840	清江浦	
31	海嶽浴日	1816	東嶽泰山	△		151	梅花校士	1840	揚州梅花書院	△
32	後塢養雲	1816	泰山後石塢	△		152	文匯讀書	1840	揚州文匯閣	△
33	石峪搨經	1816	泰山經石峪	△		153	綠野泛舟	1840	揚州	△
34	郡園召鶴	1816	泰安府署			154	雙樹尋花	1840	揚州雙樹庵	△
35	闕里觀禮	1816	曲阜孔廟	△		155	桃泉煮茗	1840	揚州桃花泉井	△
36	孔林展謁	1817	曲阜孔林	△		156	金山操江	1840	金山城操江樓	
37	明湖放棹	1816	濟南大明湖	△		157	石公驗礮	1840	鎮江石公山	
38	靈巖聽濤	1816	長清縣靈巖寺	△		158	儀徵設局	1840	儀徵縣	
39	仙蝶證緣	1819	北京			159	智信宣防	1840	洪澤湖堤壩	
40	二牖修禊	1820	北京通州	△		160	芑香寫松	1839	清江浦清晏園	

臺灣大學學術資訊網

41	史館承恩	1821	北京實錄館			161	53歲像			
42	禹門激浪	1822	黃河龍門	△		162	蚌佛紀緣	1841	揚州鳳凰橋	
43	潭柘尋秋	1822	北京潭柘寺	△		163	黃樓拜蘇	1841	徐州黃樓	△
44	夢蘁談易	1822	北京			164	夢莊述異	1841	阜寧縣夢莊	
45	史宬啟匱	1822	北京皇史宬			165	葦營合操	1841	海州葦蕩營	
46	盧溝策騎	1823	北京盧溝橋	△		166	抱孫銘喜	1841	清江浦清晏園	
47	紅橋探春	1823	揚州虹橋	△		167	英勇請纓	1841	清江浦	
48	燕子揚帆	1823	南京燕子磯	△		168	豐蕭啟埂	1841	蕭南、豐北廳	
49	大觀醉雪	1823	安慶大觀臺	△		169	安淮晚鐘	1842	洪澤湖龜山寺	△
50	隱仙聽琴	1823	南京隱仙庵	△		170	盱眙望山	1842	盱眙縣第一山	△
51	隨園訪勝	1823	南京隨園	△		171	玻璃挹泉	1842	第一山玻璃泉	△
52	莫愁尋詩	1823	南京莫愁湖	△		172	汪園問花	1842	第一山汪園	△
53	翠微問月	1823	南京清涼山	△		173	普應譚相	1842	清江浦普應寺	
54	采石放渡	1823	太平府采石磯	△		174	風虎弔古	1842	徐州風虎山	△
55	白嶽祈年	1823	徽州白嶽	△		175	康山拂槎	1842	揚州康山	△
56	歙嶺訪案	1823	徽州			176	卸肩集句	1842		
57	昉溪迎母	1823	徽州昉溪			177	江北督師	1842	揚州蜀岡	
58	與春同詠	1824	徽州府治			178	汎舟安內	1842	清江浦	
59	古關式隱	1824	徽州府治			179	中河移塘	1842	中河運道	
60	祁閻勒碑	1824	祁門縣閻門灘			180	竹舫息影	1842	清江浦竹雨舫	
61	桂宴承歡	1824	徽州府署			181	袁浦留帆	1843	清江浦	
62	雲門拄杖	1824	黃山雲門峰	△		182	微湖說泇	1843	微山湖	
63	硃泉滌俗	1824	黃山硃砂泉	△		183	分水觀汶	1843	南旺分水口	△
64	慈光問徑	1824	黃山慈光寺	△		184	臨清社火	1843	臨清州	△
65	始信覘松	1824	黃山始信峰	△		185	津門競渡	1843	天津府	△
66	芳村獻茶	1824	黃山芳村	△		186	金鼇歸里	1843	北京	
67	練浦攀轅	1824	徽州府治			187	半畝營園	1843	北京半畝園	
68	桃谷奉輿	1824	徽州	△		188	雙仙賀廈	1843	北京半畝園	
69	潁川靖盜	1824	河南潁州			189	賜瑩來象	1843	北京	
70	上南搶險	1825	河南上南			190	仙橋敷土	1843	北京酒仙橋	
71	義陵謁聖	1826	河南伏義陵	△		191	架松卜吉	1843	北京架松	
72	蘇門詠泉	1827	河南蘇門山	△		192	詩龕敘姻	1843	北京詩龕	
73	大梁補梅	1827	河南開封			193	戒臺玩松	1843	北京萬壽寺	△
74	中嶽升香	1828	嵩山中嶽廟	△		194	猗玕流觴	1843	北京潭柘寺	△
75	少林校拳	1828	嵩山少林寺	△		195	靈光指徑	1843	北京靈光寺	△
76	萬安謁墓	1828	洛陽萬安山			196	秘魔三宿	1843	北京證果寺	△
77	伊闕證遊	1828	洛陽伊闕	△		197	香界重遊	1843	北京香界寺	△
78	柴壩巡春	1828	河南蘭陽柴壩			198	五塔觀樂	1843	北京五塔寺	△
79	吹臺訪古	1828	開封吹臺	△		199	淨業壽荷	1843	北京淨業湖	△
80	蘭館寫照	1829	河南蘭陽行館			200	拜石拜石	1843	北京半畝園	
81	50歲像					201	平安就日	1843	北京平安園	
82	帝城展覲	1829	北京	△		202	董墓嘗桃	1843	北京董四墓	△
83	樂存謁師	1829	山東濟州			203	寶藏攀桂	1843	北京寶藏寺	△

臺灣大學學術資訊

84	南池誌喜	1829	濟州太白樓	△		204	臥佛遇雨	1843	北京臥佛寺	△
85	梁苑詠雪	1830	河南按察司署			205	碧雲撫獅	1843	北京碧雲寺	△
86	榴廳治書	1830	河南按察司署			206	半天御風	1843	北京半天雲	△
87	鐵塔遠眺	1830	開封鐵塔	△		207	大覺臥遊	1843	北京大覺寺	△
88	鳳岡校獵	1830	開封鳳城岡			208	龍潭感聖	1843	北京黑龍潭	△
89	大伾觀河	1830	河南大伾山	△		209	玉泉試茗	1843	北京玉泉山	△
90	藩署酬香	1830	河南布政使署			210	旃檀紀瑞	1843	北京宏仁寺	△
91	再至侍選	1830	河南按察司署			211	娜嬛藏書	1843	北京半畝園	
92	宴臺訪碑	1831	開封宴臺	△		212	天壇采藥	1843	北京天壇	△
93	敘德書情	1832	河南布政使署			213	夕照飛鏡	1843	北京夕照寺	△
94	椹澗望雲	1832	許州椹澗鎮	△		214	近光佇月	1843	北京半畝園	
95	南陽訪舊	1832	河南南陽			215	佛香瞻相	1843	正定隆興寺	△
96	元妙尋蕉	1832	南陽玄妙觀	△		216	邯鄲說夢	1843	河北邯鄲	
97	漢江曉渡	1832	湖北漢江	△		217	料廠聞捷	1843	河南中牟	
98	桃源問津	1832	湖南桃源縣	△		218	引河搶紅	1843	河南中牟	
99	穿石窺光	1832	桃源縣穿石巖	△		219	藏園話月	1843	開封藏園	△
100	明月證經	1832	沅陵縣明月匯	△		220	黃廟養疴	1844	開封黃大王廟	
101	玉屏問俗	1832	貴州玉屏縣	△		221	相國感蔭	1844	開封相國寺	△
102	相見叱馭	1832	貴州鎮遠府	△		222	牟工合龍	1844	河南中牟	
103	雲頂踏雲	1832	貴州雲頂關	△		223	同春聽箏	1845	開封	
104	黔靈驗泉	1832	貴陽黔靈山	△		224	庫倫奉使	1845		
105	甲秀賞秋	1832	貴陽甲秀樓	△		225	衛輝觀碣	1845	衛輝府比干廟	△
106	翠屏放牛	1832	貴陽翠屏山	△		226	湯山坐泉	1845	昌平州湯山	△
107	水口參燈	1832	貴陽水口寺	△		227	居庸挹翠	1845	昌平州明陵	△
108	黔疆閱武	1832	貴州大校場			228	豐臺賦芍	1845	北京豐臺	△
109	獅巖趺坐	1932	貴陽貴山	△		229	丫髻進香	1845	懷柔縣丫髻山	△
110	苗猓獻忱	1832	貴州布政使署			230	天成訪醫	1845	盤山天成寺	△
111	扶風春餞	1833	貴陽扶風山	△		231	雲罩登峰	1845	盤山雲罩寺	△
112	圖雲臥轍	1833	貴陽圖雲關	△		232	靜寄瞻樓	1845	盤山靜寄山莊	△
113	牟珠探洞	1833	貴定牟珠洞	△		233	晾甲酌泉	1845	盤山晾甲石	△
114	飛雲攬勝	1833	黃平縣飛雲崖	△		234	中盤紀石	1845	盤山中盤	△
115	酉山鼓棹	1833	湖南酉山	△		235	劍臺品松	1845	盤山舞劍臺	△
116	機巖志異	1833	湖南瀘溪機巖	△		236	園居成趣	1845	北京半畝園	
117	清浪下灘	1833	沅陵縣清浪灘	△		237	房山拜陵	1845	北京大房山	△
118	流花泛湖	1833	武陵縣流花口	△		238	五福祭神	1845	北京半畝園	
119	荊營驗馬	1833	湖北荊州府			239	退思夜讀	1845	北京半畝園	
120	息壤攷古	1833	湖北荊州府			240	煥文寫像	1845	北京半畝園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4：劉愔《悟蘐亭畫稿》圖目（備註欄標有「△」者為名勝圖）

	圖名	地點	備註		圖名	地點	備註
1	衡嶽	南嶽衡山	△	28	司徒嶺泉	湖南安化	△
2	瀟湘夜雨	湖南永州瀟湘樓	△	29	明月山	湖南瀏陽	△
3	漁村夕照	湖南桃源	△	30	湯泉	湖南寧鄉	△
4	洞庭秋月	湖南岳陽	△	31	嵇架山	湖南寧鄉	△
5	山市晴嵐	湖南昭山	△	32	優鉢泉	湖南寧鄉	△
6	平沙落雁	湖南衡州迴雁峰	△	33	麒麟峰	湖南寧鄉	△
7	煙寺晚鐘	湖南衡山橫龍寺	△	34	謝英臺	湖南寧鄉	△
8	遠浦歸帆	湖南湘陰林子口	△	35	獅顧	湖南寧鄉	△
9	江天暮雪	湖南長沙	△	36	泰山	山東泰安	△
10	月巖	湖南道州	△	37	孔林	山東曲阜	△
11	黃門巖	湖南臨武	△	38	尼山	山東曲阜	△
12	洞庭觀步	湖南岳州	△	39	蒙山	山東蒙陰	△
13	涪溪	湖南祁陽	△	40	徂來山	山東泰安	△
14	綠蘿溪	湖南桃源	△	41	趵突泉	山東濟南	△
15	桃源洞	湖南桃源	△	42	南武山	山東嘉祥	△
16	漁仙洞	湖南桃源	△	43	鳧嶧山	山東鄒縣	△
17	白雲山	湖南邵東	△	44	玉符山	山東長清	△
18	沅河仙屋	湖南沅水	△	45	丹崖	山東登州	△
19	飛山	湖南靖州	△	46	皖公山	安徽潛山	△
20	連珠巖	湖南郴州	△	47	龍眠山莊	安徽舒城	△
21	龍洞	湖南湘潭	△	48	石佛洞	江西石鐘山	△
22	韶山阪田	湖南湘潭	△	49	匡廬山	江西九江	△
23	空靈岸	湖南湘潭	△	50	西山仙峰	江西葛仙峰	△
24	石洞沖	湖南湘鄉	△	51	黎塘二洞	江西萍鄉	△
25	白鶴泉	湖南長沙	△	52	五柳館	江西廬山	△
26	雲英洞口	湖南茶陵	△	53~86	江景	江蘇蘇州至湖南長沙	△
27	鉴塘洞	湖南湘鄉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清—民國）上海申報館編
《申報》，據上海圖書館藏原報影印，上海：上海書店，1982-1987。
（明）王立道
《具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77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以下簡稱《四庫全書》）
（明）王圻
《三才圖會》，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清）王錫祺輯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清光緒年間上海著易堂排印本，1877-1897。
（明）王鏊
《震澤集》，收入《四庫全書》，1256冊。
（清）尤侗
《悔菴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7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明）何景明
《大復集》，收入《四庫全書》，1264冊。
（明）吳寬
《家藏集》，收入《四庫全書》，1255冊。
（明）李東陽
《懷麓堂集》，收入《四庫全書》，1250冊。
（明）周瑛
《翠渠摘稿》，收入《四庫全書》，1254冊。
（民國）周震麟修，劉宗向纂
《民國寧鄉縣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明）林文俊
《方齋存稿》，收入《四庫全書》，1271冊。
（明）邱濬
《重編瓊臺稿》，收入《四庫全書》，1248冊。
（清）金菁茅
《張南山年譜撮略》，收入《北京圖書館珍藏年譜叢刊》，136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清）紀昀等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倪岳
《青谿漫稿》，收入《四庫全書》，1251冊。
（明）徐溥
《謙齋文錄》，收入《四庫全書》，1248冊。
（民國）孫殿起
《販書偶記》，上海：上海書店，1992。
（清）高晉編
《南巡盛典》，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
（清）張井
《二竹齋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5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張維屏
《花甲閑談》，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清）張寶
《泛槎圖》，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
（明）章潢
《圖書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明）莊昶
《定山集》，收入《四庫全書》，1254冊。
（清）陶澍
《陶文毅公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1502-150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
（清）陳夢雷，蔣廷錫等編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上海：中華書局，1934。
（明）彭紹
《彭惠安集》，收入《四庫全書》，1247冊。
（清）彭齡等編
《西巡盛典》，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
（明）程敏政
《篁墩文集》，收入《四庫全書》，1251冊。
（明）楊爾曾編
《海內奇觀》，收入《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第八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明）楊繼盛
《楊忠愍集》，收入《四庫全書》，1278冊。
（清）劉愔
《悟蘐亭全集》，收入尹瘦石編，《中國古畫譜集成》，第8卷，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潘希曾
《竹澗集》，收入《四庫全書》，1266冊。
（清）蔣溥等編
《盤山志圖》，收入曲延鈞編，《中國清代宮廷版畫》，第7卷，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2。
（明）邊貢
《華泉集》，收入《四庫全書》，1264冊。
（明）顧清
《東江家藏集》，收入《四庫全書》，1261冊。
（清）麟慶
《鴻雪因緣圖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近人論著

王正華
2005 〈乾隆朝蘇州城市圖像：政治權力、文化消費與地景塑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期，頁115-184。
Wang, Cheng-hua
2005 “Reshaping Suzhou: Political Power,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the Making of Landmarks in the Cityscapes of the Qianlong Period,”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vol. 50, pp. 115-184.
司馬朝軍
2005 《《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Sima, Chao-jun
2005 *Siku quanshu zongmu bianzuan kao* (Studies o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Annotated Catalog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古原宏伸
1982 〈朱昂之筆「吳門荒政冊」〉，《奈良大學文化財學報》，1集，頁23-43。
Kohara, Hironobu
1982 “Shu Kousi hitsu Gomon arasei satsu (Zhu Angzhi’s Painting Album “Famine Relief Efforts in Suzhou”),” *Bulletin of the Study of Cultural Properties, Nara University*, no. 1, pp. 23-43.
朱鴻
2011 〈《徐顯卿宦迹圖》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期，頁47-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Zhu, Hong
2011 "A Study of the Painting Folio 'Xu Xianqing Huan Ji Tu',"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2, pp. 47-80.
巫仁恕
2005 〈清代士大夫的旅遊活動與論述—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50期，頁235-285。
Wu, Jen-shu
2005 "Gentry Travel Culture in Qing-Dynasty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Jiangnan Regio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vol. 50, pp. 235-285.
呂季如
2012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山水版畫研究》,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Lu, Chi-ju
2012 *Gujin tushu jicheng shanchuan dian shanshui banhua yanjiu* (Research on Woodcut Illustrations of Landscapes on *Completed Collection of Graphs and Writings of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Features on Mountains and Rivers*), New Taipei City: Huamulan Culture Publishing Company.
周心慧
2000 《中國古版畫通史》, 北京：學苑出版社。
Zhou, Xin-hui
2000 *Zhongguo gubanhua tongshi* (A General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oodblock Prints), Beijing: Xueyuan chubanshe.
馬雅貞
2008 〈中介於地方與中央之間：《盛世滋生圖》的雙重性格〉,《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 24期，頁259-322。
2011 〈戰勳與宦蹟：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明代研究》, 17期，頁49-87。
Ma, Ya-chen
2008 "Mediating between Local Society and the Center: The Dual Character of 'Burgeoning Life in a Resplendent Age,'"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24, pp. 259-322.
2011 "Military Achievement and Official Accomplishment: Ming Images of Warfare and the Visual Culture of Officialdom," *Journal of Ming Studies*, no. 17, pp. 49-87.
夏長樸
2005 〈《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故宮學術季刊》, 23卷2期，頁83-128。
Hsia, Chang-pu
2005 "*The Annotated Catalog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in Relationship to Han and Sung Learning,"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23:2, pp. 83-1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正明
1997 〈明代重臣王瓊〉,《晉陽學刊》, 5期，頁103-108。
Zhang, Zheng-ming
1997 "Mingdai zhongchen Wang Qiong (The Ming-Dynasty Statesman Wang Qiong)," *Academic Journal of Jinyang*, no. 5, pp. 103-108.
張毅
2008 〈略論梁夢龍的歷史貢獻〉,《社會科學論壇》, 9B期，頁120-124。
Zhang, Yi
2008 "Luelun Liang Menglong de lishi gongxian (On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Liang Menglong)," *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 no. 9B, pp. 120-124.
傅立萃
1997 〈謝時臣的名勝四景圖—兼談明代中期的壯遊〉,《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 4期，頁185-222。
Fu, Li-tsui
1997 "Paintings of the Four Famous Views by Hsieh Shih-chen: the Vogue of Travel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4, pp. 185-222.
傅熹年
1993 〈訪美所見中國古代名畫札記（下）〉,《文物》, 7期，頁73-75。
Fu, Xi-nian
1993 "Fang Mei suojian Zhongguo gudai minghua zhaji (xia) (Notes on Famous Chinese Paintings Seen during My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Part 2)," *Wenwu* (Cultural Relics), no. 7, pp. 73-75.
楊麗麗
2005 〈一位明代翰林官員的工作履歷：《徐顯卿宦迹圖》圖像簡析〉,《故宮博物院院刊》, 4期，頁42-66。
Yang, Li-li
2005 "The Working Career of a Hanlin Official: An Analysis of the Painting Folio *Xu Xianqing huanji tu*,"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4, pp. 42-66.
鄭振鐸
1999 《中國古代木刻畫選集》, 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Zheng, Zhen-duo
1999 *Zhongguo gudai mukehua xuanji* (Selected Ancient Chinese Woodcuts), Beiji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瀧本弘之
2008 《中国歴史名勝大図典》, 東京：遊子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akimoto, Hiroyuki
2008 *Chūgoku rekishi meishō zuten* (Illustrated Dictionary of Famous Spots and Historic Sites of Ancient China), Tokyo: Yūshikan.

龔建毅
1993 〈送寇公去任圖〉,《文物》, 12期, 頁72-81。

Gong, Jian-yi
1993 "Song Kou gong quren tu (Paintings for Suzhou Prefect Kou Shen's Resignation from Office)," *Wenwu* (Cultural Relics), no. 12, pp. 72-81.

Fu, Li-tsui Flora
2009 *Framing Famous Mountains: Grand Tour and Mingshan Paintings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Kindall, Elizabeth
2009 "Visual Experience in Late Ming Suzhou 'Honorific' and 'Famous Sites' Paintings," *Ars Orientalis*, vol. 36, pp. 137-177.

Lin, Li-chiang
2011 "A Study of the *Xinjuan hainei qiguan*, a Ming Dynasty Book of Famous Sites," in Jerome Silbergeld, Dora C. Y. Ching, and Alfreda Murck, eds., *Bridges to Heaven: Essays on East Asian Ar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en C. Fo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779-812.

Mei, Yun-chiu
2008 "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Meyer-Fong, Tobie
2003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Seeing the Sights in Yangzhou from 1600 to the Present," in Ko-wu Huang ed., *When Images Speak: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Cultural Mapping in Modern China*,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pp. 213-251.

Moss, Paul
1986 *The Literati Mode: Chinese Scholar Paintings, Calligraphy and Desk Objects*, Hong Kong: Andamans East Internationa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張寶，《泛槎圖》（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初集，4b-5a。
圖2　張寶，《泛槎圖》，六集，頁43b-44a。
圖3　張寶，《泛槎圖》，續集，頁11b-12a。
圖4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頁142。
圖5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62。
圖6　張寶，《泛槎圖》，三集，頁27b-28a。
圖7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69。
圖8　張寶，《泛槎圖》，三集，頁33b-34a。
圖9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159。
圖10　張寶，《泛槎圖》，初集，頁7b-8a。
圖11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169。
圖12　張寶，《泛槎圖》，四集，頁23b-24a。
圖13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276。
圖14　張寶，《泛槎圖》，初集，頁16b-17a。
圖15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頁233。
圖16　張寶，《泛槎圖》，四集，頁14b-15a。
圖17　高晉編，《南巡盛典》（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卷101，頁11b-12a。
圖18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172。
圖19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86。
圖20　高晉編，《南巡盛典》，卷98，頁16b-17a。
圖21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123。
圖22　高晉編，《南巡盛典》，卷96，頁29b-30a。
圖23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740。
圖24　蔣溥等編，《盤山志圖》，收入曲延鈞編，《中國清代宮廷版畫》（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2），第7卷，頁94-95。
圖25　劉愔，《悟蘐亭畫稿》，收入尹瘦石編，《中國古畫譜集成》（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第8卷，頁197-200。
圖26　高晉編，《南巡盛典》，卷96，頁5a-6b。
圖27　劉愔，《悟蘐亭畫稿》，頁233-235。
圖28　高晉編，《南巡盛典》，卷92，頁1a，37b-38a。
圖29　張寶，《泛槎圖》，四集，頁29b-30a。
圖30　張寶，《泛槎圖》，三集，頁18b-19a。
圖31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686。
圖32　筆者於2005年自攝實景照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3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頁318。

圖34 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元畫全集》，第5卷，第1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頁278-280。

圖35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繪畫卷（歷史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16-17。

圖36-37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繪畫卷（歷史畫）》，頁21。

圖38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282。

圖39 楊麗麗，〈一位明代翰林官員的工作履歷：《徐顯卿宦迹圖》圖像簡析〉，《故宮博物院院刊》，4期（2005），頁51。

圖40 楊麗麗，〈一位明代翰林官員的工作履歷：《徐顯卿宦迹圖》圖像簡析〉，頁50。

圖41 尤侗，《年譜圖詩》，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第7冊，頁658。

圖42 尤侗，《年譜圖詩》，頁633。

圖43 《明代吳門繪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頁195。

圖44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322。

圖45 尤侗，《年譜圖詩》，頁656。

圖46 楊爾曾編，《海內奇觀》，收入《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第八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2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　張寶《泛槎圖》〈乘槎破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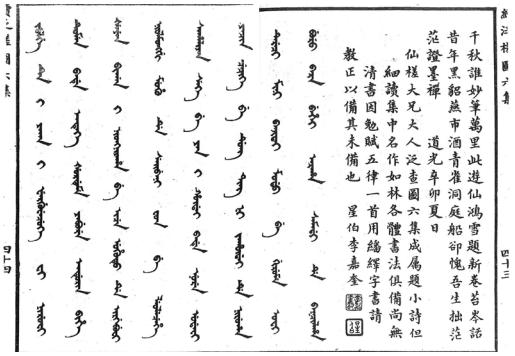


圖2　張寶《泛槎圖》李嘉奎題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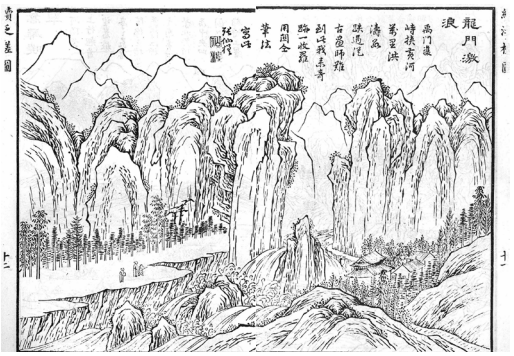


圖3　張寶《泛槎圖》〈龍門激浪〉



圖4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禹門激浪〉



圖5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禹穴徵奇〉



圖6　張寶《泛槎圖》〈禹陵謁聖〉

臺灣大學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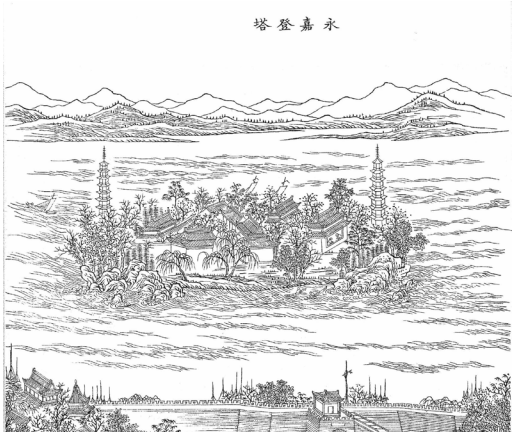


圖7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永嘉燈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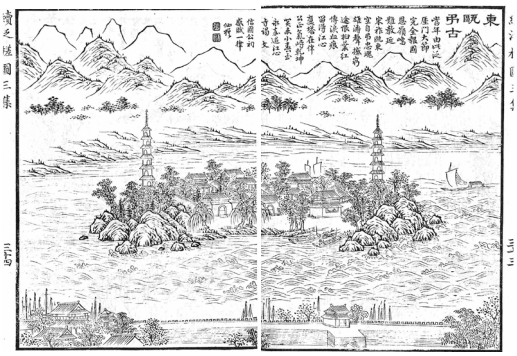


圖8　張寶《泛槎圖》〈東甌弔古〉



圖9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燕子揚帆〉



圖10　張寶《泛槎圖》〈燕子風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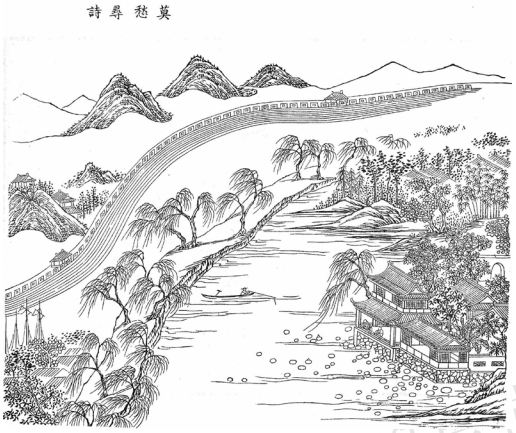


圖11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莫愁尋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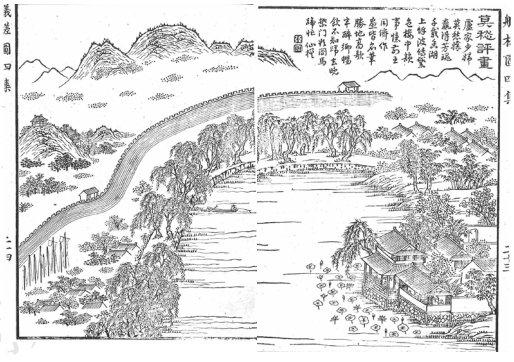


圖12　張寶《泛槎圖》〈莫愁評畫〉

臺灣人類學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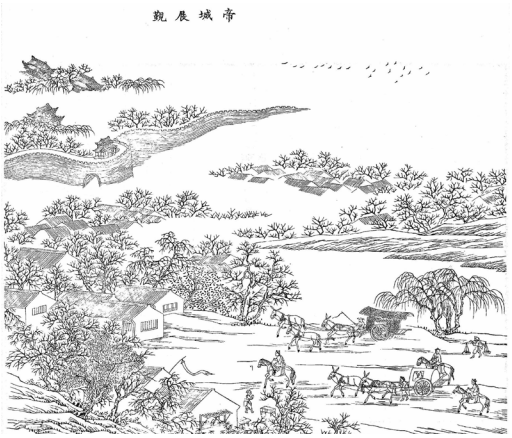


圖13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帝城展覲〉



圖14　張寶《泛槎圖》〈帝城春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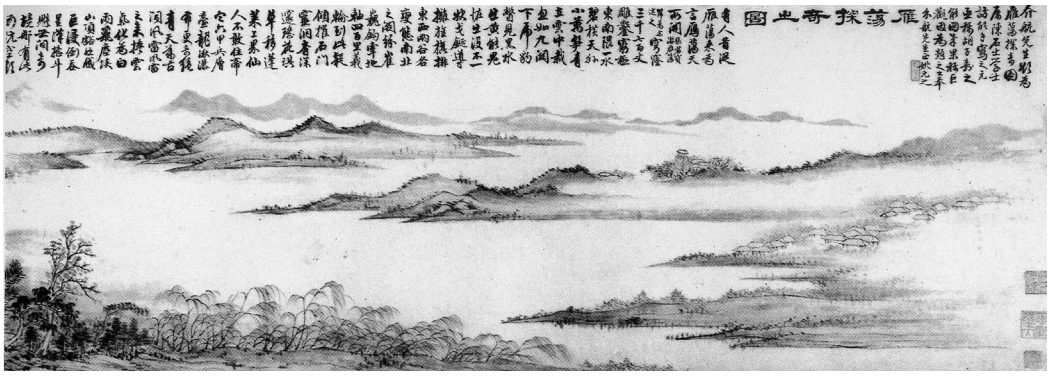


圖15　胡九思《雁蕩探奇圖卷》局部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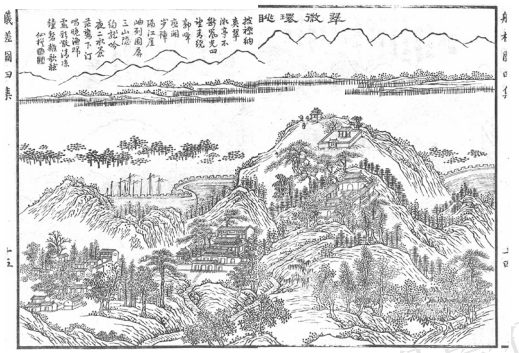


圖16　張寶《泛槎圖》〈翠微環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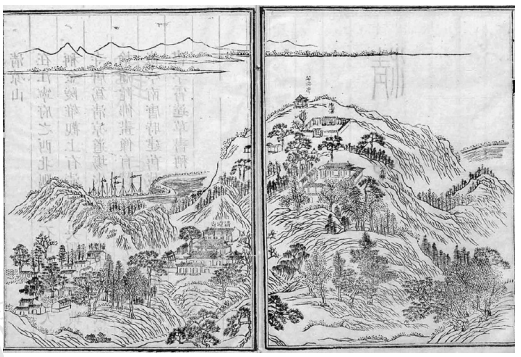


圖17　高晉編《南巡盛典》〈清涼山〉

臺灣大學學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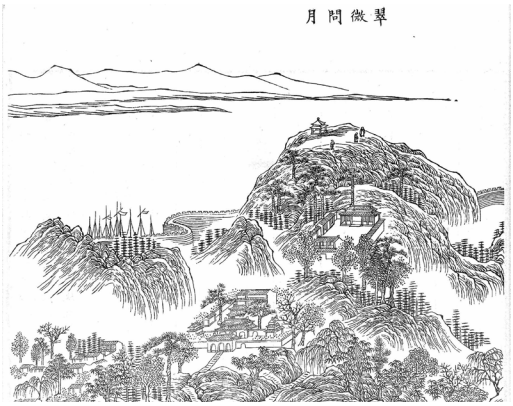


圖18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翠微問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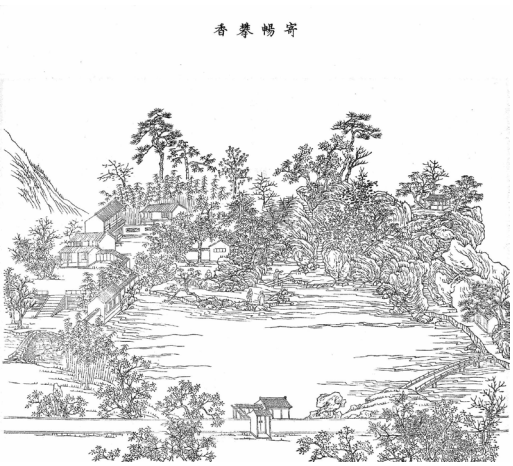


圖19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寄暢攀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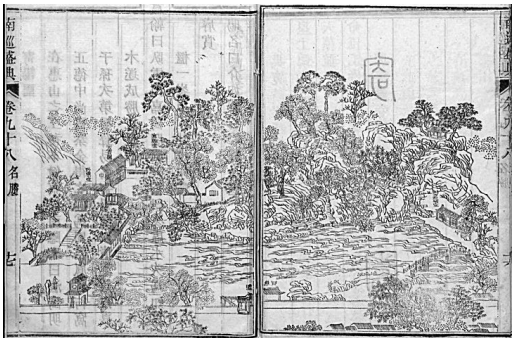


圖20 高晉編《南巡盛典》〈寄暢園〉



圖21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孔林展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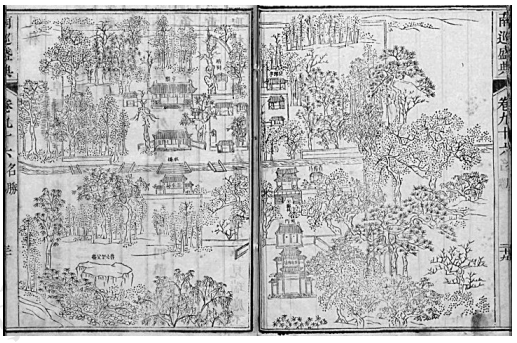


圖22 高晉編《南巡盛典》〈孔林〉

臺灣大學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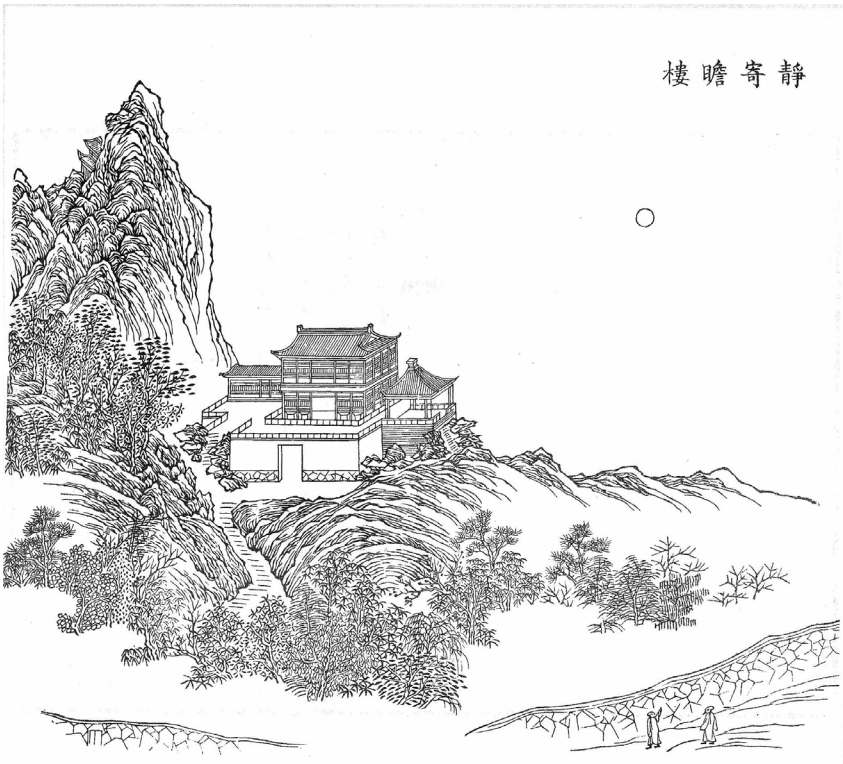


圖23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靜寄瞻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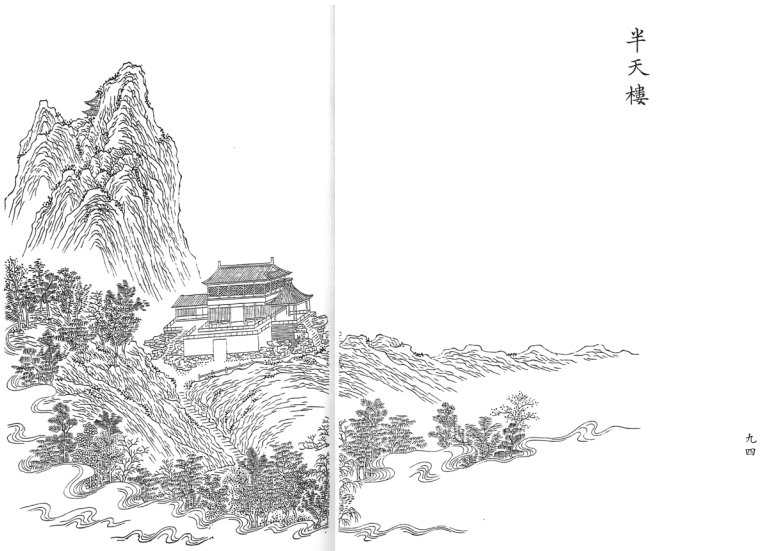


圖24　蔣溥等編《欽定盤山志》〈半天樓〉

臺灣人文學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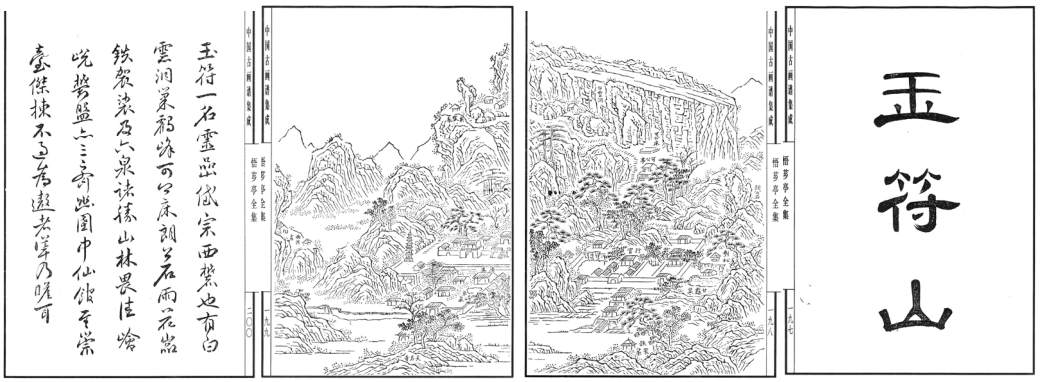


圖25 劉愔《悟蘐亭畫稿》〈玉符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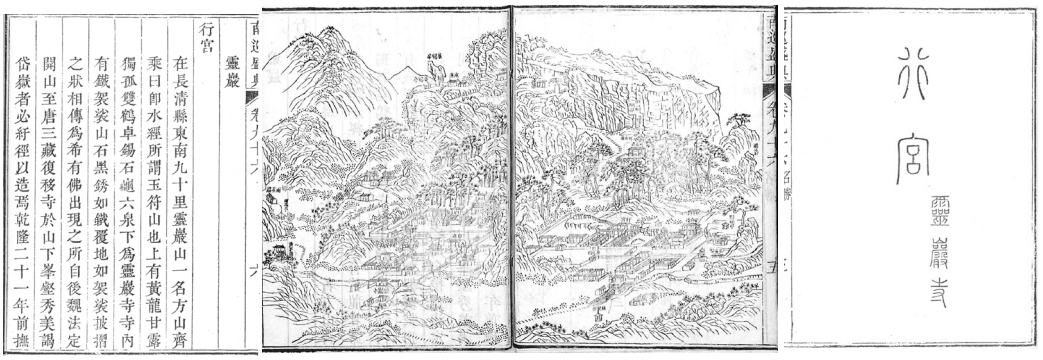


圖26 高晉編《南巡盛典》〈靈巖寺行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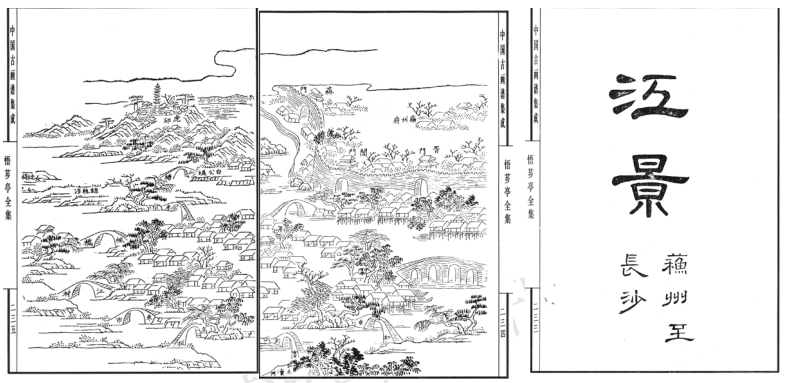


圖27 劉愔《悟蘐亭畫稿》〈江景〉局部

臺灣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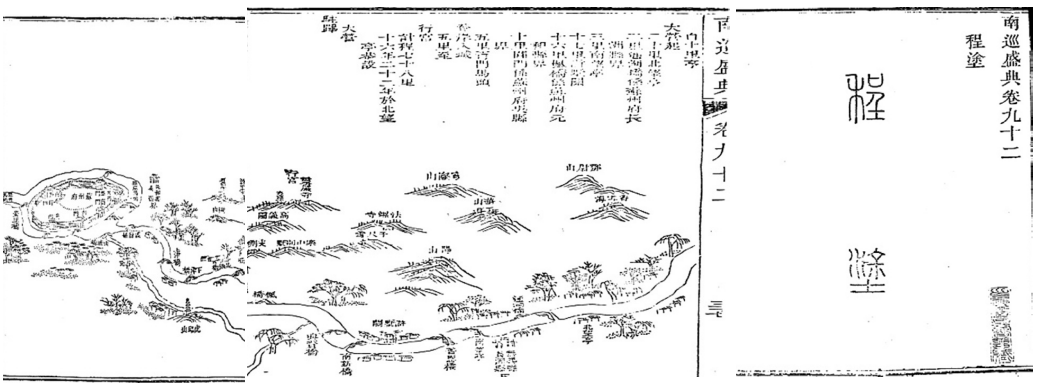


圖28　高晉編《南巡盛典》〈程塗〉局部



圖29　張寶《泛槎圖》〈大山廬墓〉



圖30　張寶《泛槎圖》〈家園宴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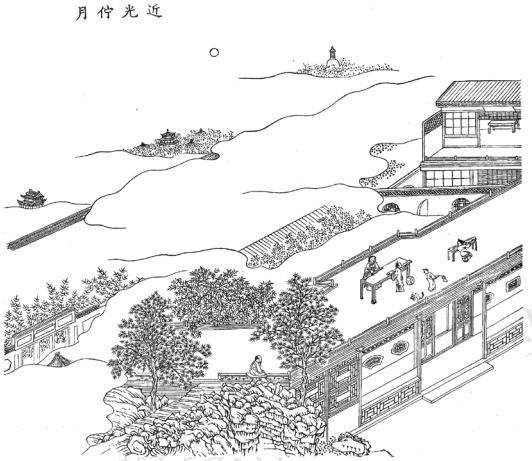


圖31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近光佇月〉

臺灣人權學術資料庫



圖32　山東泰山壺天閣廷鎏石刻楹聯

臺灣大學學術



圖33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元妙尋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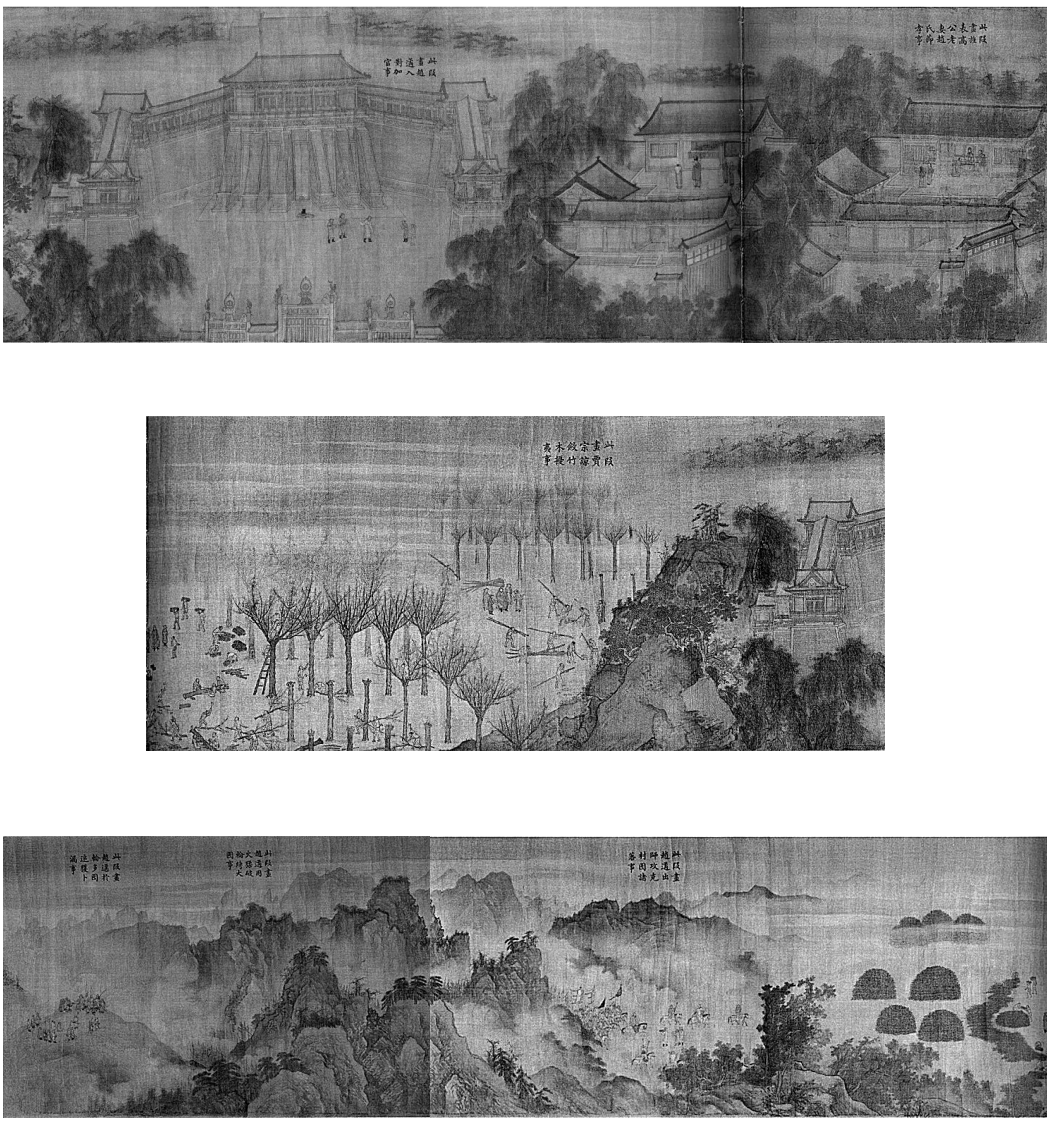


圖34　元人《趙遹濾南平夷圖卷》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5　明人《王瓊事蹟圖》〈雲程祖道〉　中國國家博物館



圖36　明人《王瓊事蹟圖》〈經略三關〉中國國家博物館



圖37　明人《王瓊事蹟圖》〈督理漕運〉中國國家博物館

臺灣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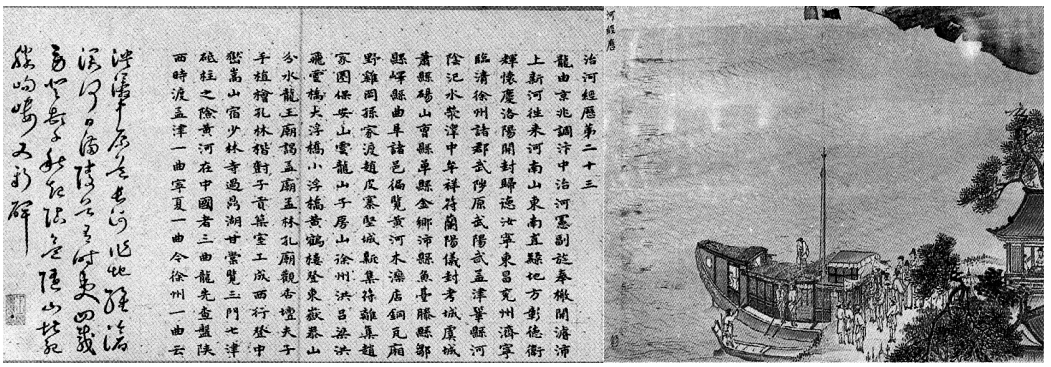


圖38　沈介《梁夢龍恩榮百紀圖》〈治河經歷〉 北京首都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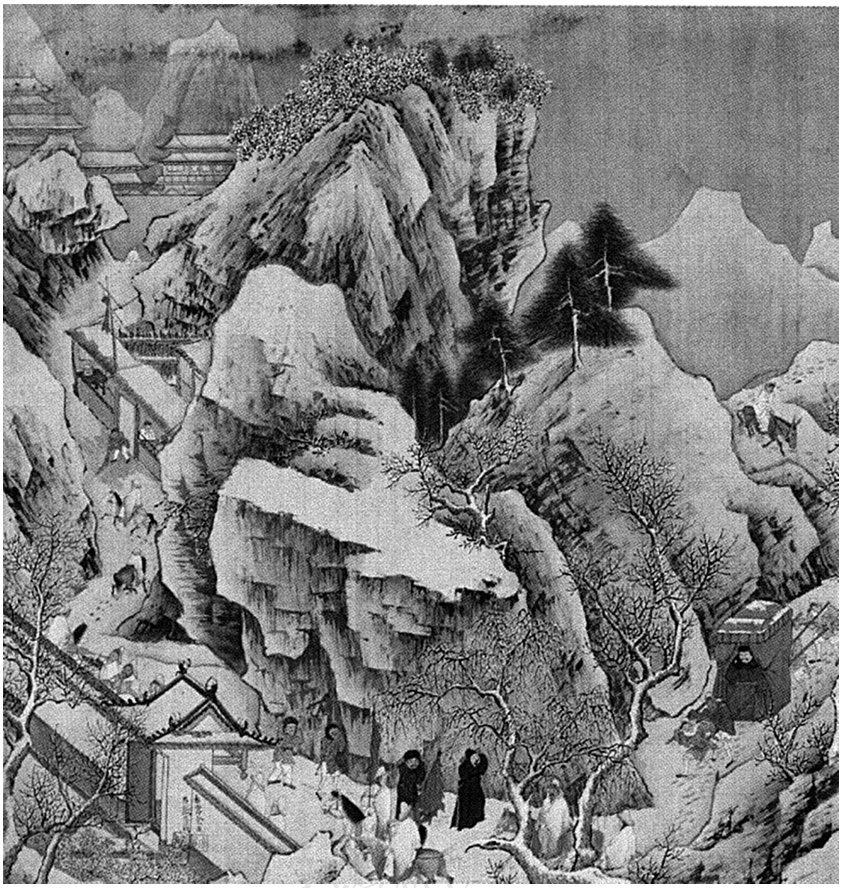


圖39　余士、吳鉞《徐顯卿宦蹟圖冊》〈衝雪還朝〉 北京故宮

臺灣人類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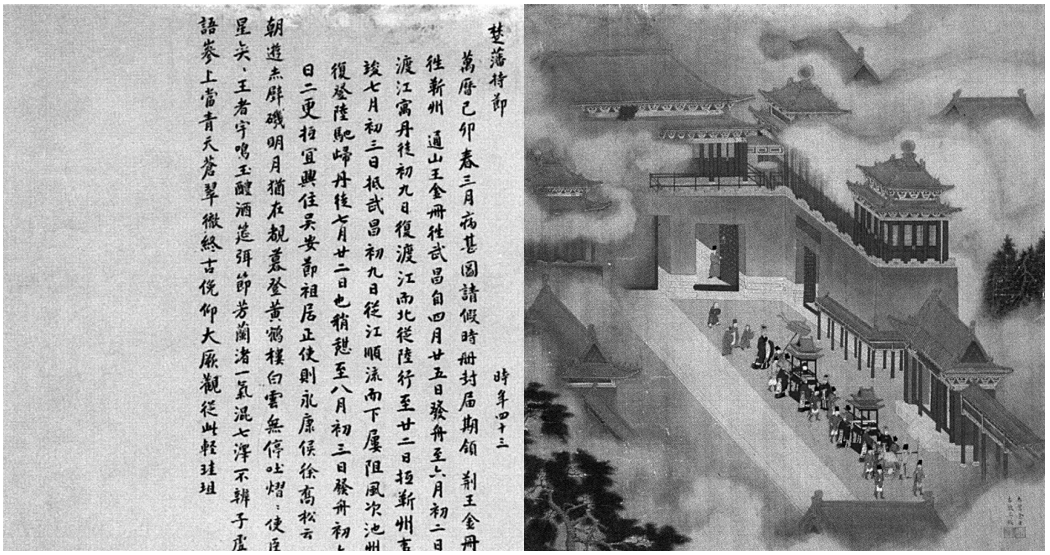


圖40　余士、吳鉞《徐顯卿宦蹟圖冊》〈楚藩持節〉 北京故宮



圖41　尤侗《年譜圖詩》〈西山築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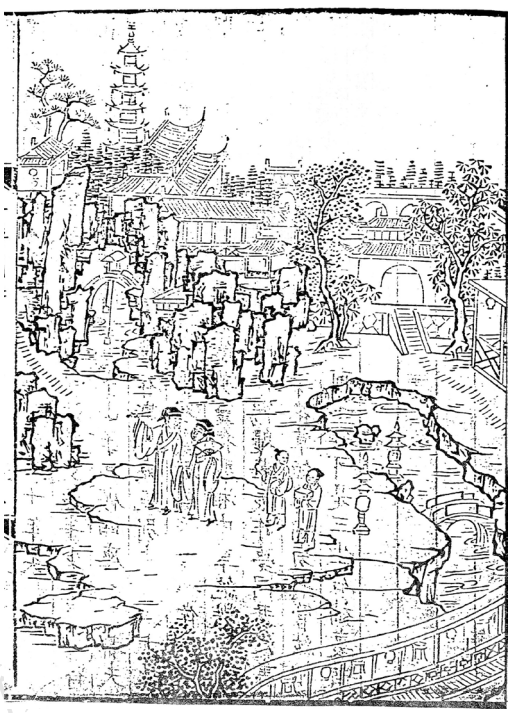


圖42 尤侗《年譜圖詩》〈春山攜友〉

臺灣大學學術



圖43　張宏《蘇臺十二景圖冊》〈虎丘夜月〉 北京故宮



圖44　袁尚統《蘇臺十二景圖冊》虎丘　上海博物館



圖45　尤侗《年譜圖詩》〈西湖泛月〉



圖46　楊爾曾編《海內奇觀》〈六橋煙柳〉

臺灣大學學術

Privatizing the Imperial Landscape: The Rise of Pictorial Autobiographies and Travel Memoir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Mei, Yun-chiu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ictorial biographies or memoirs had been constantly appropriated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examination candidates as an alternative way of chronicling their personal histories and public services. With an attempt to preserve the likeness of biographies or to dramatize their life stories, this type of work was traditionally executed by artists specializing in narrative figure painting or portraiture. The only exceptions are those richly illustrated autobiographies and travel memoirs from the Jiaqing-Daoguang period (1796-1850) of the Qing, including Zhang Bao's (b. 1763) *Fancha tu*, Linqing's (1791-1846) *Hongxue yinyuan tuji*, Zhang Weiping's (1780-1859) *Huajia xiantan*, and Liu Yin's *Wuxiangting huagao*, which unequivocally prefer landscape as a representational vehicle to figure painting. Consequently, the main focus of their renditions also shifts from human activities to actual places, many of which were significant to the lives and careers of the autobiographers, such as their offices, residences, family estates, ancestral cemeteries, and hometowns. Meanwhile, in order to exhibit their extensive travel experience and geographical knowledge, these autobiographers were also keen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record of famous sites which they personally visited during their journeys across the empire. As a result, their visual memoirs could also stand out as an encyclopedia of iconic landmarks despite the presence of some autobiographical element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individual endeavors to compile and publish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s of iconic landmarks, which flourished particularly in the late Ming, were swiftly interrupted follow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Qing. Throughout the eighteenth century, known as the golden age of Qing power, only those imperially sponsored compilation projects came to fruition. The aforementioned nineteenth-century privately-made compilations thus not only afford more personalized and diversified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vast territories under Qing rule, but also epitomize the resurgence of individual efforts to launch ambitious cultural projects after a century long hiatus.

Keywords: pictorial biographies, pictures of famous landmarks, Zhang Bao, Linqing, Zhang Weip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